

現代大學與國文教育

——以四〇年代大一國文教材選本為起點的論析

梅 家 玲^{*}

提 要

「國文」此一概念從醞釀成型到進入正規學制，並非橫空出世，一蹴而躋，而是在長時期不斷的摸索研議之中歧路徘徊，步履躊躇，始得終底於成。其間的千迴百轉，其實是連串觀念、制度、文體想像、教材教法的不斷嘗試調整，亦所以投射出時代轉型、空間移易之際的多方折衝。本文以四〇年代的幾種大學國文教材選本為討論起點，研究目的不在於就現代大學之國文教育問題進行全面性研探，而是希望以少總多，揭示其間的「問題性」，進而深入思辨。全文首先梳理「國文」概念的生成及其在現代大學課程設置的源起；繼而論析四〇年代大一國文教材選本中的「文／白」、「語／文」問題，以及其中的國族意識、文化想像與語文形構；最後，則就「國」與「文」所衍生的問題，進行反思。

關鍵詞：現代大學、國文教育、四〇年代、教材選本

本文於 109.06.17 收稿，109.09.16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DOI:10.6281/NTUCL.202009_(70).0005

Modern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A Study Based on Issues Regarding College Freshmen Chinese Textbooks in China and Taiwan in the 1940s

Mei, Chia-Ling*

Abstract

Beginning from constructing its concept, “national language” has taken a long time to become institutionalized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s of China and Taiwan respectively. This journey is convoluted. It not only involves constant adjustments to various perceptions, institutions, styles, and pedagogy, but also reflects the negotiations of changing values regarding Mandarin Chinese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under a spatial and temporal transi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several selected Chinese textbooks for college freshmen respectively in China and Taiwan in the 1940s. Rather than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the study aims to problematize and reevalu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This article will first revisit the making of “national language” and its application into college education as a mandatory curriculum. It then discusses the core issues of the education, such as the proportion of “modern/ classical” and “spoken/ written” Chinese, formalism in Chinese language,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Finally, it moves on to rethinking the issues concerning “nation” and “language”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

***Keywords:* modern universities,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1940s, college freshmen Chinese textbooks**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現代大學與國文教育

——以四〇年代大一國文教材選本為起點的論析*

梅 家 玲

「現代大學」¹在中國的興起與建制，是教育文化史上劃時代的盛事；它不只引進現代國家社會的各種觀念與知識，更牽動此後知識體系的重構，教育理念的調整。基本上，大學教育採分科體制，其目的在培養「專家」而非「通才」。但與此同時，各科系所應修習之課程中，仍設置有若干「共同科目」，所意味的，正是某些特定素養需要與時俱進，不可或缺。而「國文」，始終是其中一個重要項目。

時當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臺灣各級學校屢為「國文」課綱之調整而聚訟紛云，大學中是否仍需要以「國文」為共同必修課程，也成為各方關注的議題。不過，在爭議此一問題之前，或許更需要釐清的根本問題是：何謂「國文」？「國文」此一概念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它負載了教育者或主政者什麼樣的期待與想像？隨著時光流轉，空間移徙，「國文」的內涵與教育目標是否也曾因時地而制宜，多所遷易？再者，在現今教育體制之中，從小學開始，即已有「國

* 本論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現代國家「國文」之學科形構及其相關問題研究](MOST 109-2424-H-002-001)部分研究成果。

¹ 本文所討論的「現代大學」，對應的是西方的「University」；亦即取法於歐西，具有分科制度的高等教育學校，其義與中國古已有之的「大學」，以及晚清時期的「大學堂」皆有所不同。有關「現代大學」的意涵及相關論述，可參見蔡元培：〈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冊，頁7。陳平原：〈中國大學百年？〉，收入陳平原：《歷史、傳說與精神——中國大學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頁15-45。

語」、「國文」課程，「現代大學」為何仍需要此一學科的設置？「國語」與「國文」又有何異同？這些都是有待深思細論的問題，不宜簡而化之。就此進行學術性、問題性的探討，尤屬必要。其間所關涉的面向原本經緯萬端，但由於「大學國文」得以在現代教育體制中定型為必修科目並穩定發展，四〇年代實為關鍵時期，它始於對日抗戰期間，迄於勝利還都，中共建國，以及臺灣結束日本殖民統治；涵蓋的時間雖然並不長，卻因時代動盪，政權更易，使得「國文」教育所輻輳出的面向，遠較先前複雜，由此切入，適得以小見大，觀微知著。再者，國文教學必得憑藉教材教本，文本選目的斟酌取捨，每每投射著特定的教育理念與目的。因此，選擇四〇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幾種《大學國文選》為討論起點，就其中所糾結的「文／白」、「語／文」，以及國族意識、文化想像等問題進行研探，或將更能深入肯綮。

也因此，本文目的不在於就現代大學之國文教育與教材選本問題進行全面性研探，而是以四〇年代幾種最具代表性的選本為聚焦點，希望以少總多，為相關問題梳理端緒，進而深入思辨。基於此一考慮，所據以研探的選本將集中於下四項：1. 燕京大學選本：郭紹虞編選的《近代文編》與《學文示例》；2. 教育部選本：《部定大學用書·大學國文選》；3. 西南聯大選本：《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與《大一國文習作參考文選》；4. 臺灣大學選本：魏建功的《大學國語文選》與許壽裳的《大學國文選》。原因是：燕京大學、西南聯大與臺灣大學，皆為當時極具代表性的大學，負責編選者，亦皆為當時的重量級學者；教育部選本，則反映了主政者的教育理念。其中，燕京大學選本兼顧閱讀與寫作，教育部選本側重經典閱讀訓練，二者選篇皆為「古文」。西南聯大選目兼重古今與讀寫，對於白話文寫作的訓練著力尤深；臺灣大學選本則在「國文選」之外，另有「國語文選」，這既是戰後的特殊語文環境使然，也體現出「國『語』」與「國『文』」之間相生互補、錯綜游移的動態關係，以及背後所隱含的國族意識與文化想像。以臺大選本作為「問題化」的起點，與其它三者進行對話，亦將使「國」與「文」的論析，得以有更多重面向的開展。

不過，由於教材編選及其間「文／白」、「語／文」等問題的糾結，實則

其來有自，為正本清源，以下將先就「國文」概念的生成及其在現代大學中的課程設置源起略作釐析。

一、「國文」概念的生成及其在 現代大學課程的設置源起

初步看來，作為現代教育基本學科之一的「國文」，其在語詞構成及概念內涵上都至少包括了「國」與「文」兩個層面。「國」指的應是現代「國家」觀念，「文」則兼括「語言」與「文字」；二者交相為用，所指向的，即是以全國共通、統一共享的語言文字進行語文教育，以期促進人際溝通，提昇人文素養，進而體現國民精神文化，形塑全民「共同體」意識。無可否認地，它與十九世紀以來，民族國家的興起深相關聯；然而其概念意涵，卻並非不證自明，自始即然；而是經過一段漫長時間的折衝求索，才得以逐步生成。

一般而言，無論學校體制，抑是實際學習次第，大學教育奠基於中小學教育，由童蒙教育以至於初、高等教育，原應是逐步漸進的過程。然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由於求變心切，清季官方的教育改革，卻是以「本末倒置」的進程展開的——它以語言學堂的出現為嚆矢，接下來是軍事技術學堂、各類實業學堂、大學學堂，最後才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小學童蒙教育。此外，醞釀於晚清的「現代教育」，也並不像其它多數國家，先由政府頒佈有關的法令規章，政策制度，自上而下地推動，反是先由各地方、各部門，甚至民間自發進行，經過長時期的各自為政之後，才由國家頒佈統一學制和課程。² 官方與民間教育的相生互補，是為中國現代教育發展的一大特色；特別是民間對於「蒙學」課程的改革推動，影響深遠。探究「國文」概念的生成、「國語」與「國文」學科的醞釀形塑及相互關係、「國文」在現代大學中的課程設置，以及相應而生的種種問題，亦必須由此著眼。

² 田正平：〈中國教育近代化研究叢書·總前言〉，收入王建軍：《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3。

（一）晚清「國文」論述的生成與「大學」國文課程之設置

事實上，「國文」的概念，最先即是在民間蒙學教育的相關論述之中被挪用，並且落實為課程實踐。至於作為體制內的現代大學必修課程，實則為時甚晚。從字源考索，「國文」一詞未見於古籍，直到晚清，才經由日本轉介而進入時人視域，進而成為學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至於現代意義上「國語」一詞的出現，則稍早於「國文」。其源起，當是甲午敗戰後，朝野有識之士，都體認到日本國富兵強，舉國同心，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級學校教育都高度重視「本國語文」，因而對日本學制多所關注。如光緒二十二年（1896）冬，梁啟超發表《變法通議·論師範》，列舉日本尋常師範學校制度，即提到：「其所教者有十七事，一修身，二教育，三國語，四漢文……」。並在「國語」下註明：「謂倭文倭語」，其所指涉者，即是具有全國統一之標準語意義的日本語言。³ 其後不少朝野人士紛紛建言清廷宜統一各地語言、編輯「國語課本」，以及在學校中設置「國語學科」，當時雖未及實施，但「國語」一詞的現代意義，已然成形。

此外，就如同「國語」一詞的觀念係由日本師範學校制度中的「倭文倭語」轉介而來，「國『文』」一詞亦然。它早先應是出現於民間知識分子對於日本小學校章程的譯介文字之中。以旨在啟蒙孩童的《蒙學報》為例，它在創刊後的次年（1898），便刊出由松林純孝所翻譯的〈日本小學校章程〉，作為當時蒙學教育的「他山之石」。文中除明確指定小學所須修習之學科，還具體說明了各科教授的原則和進行次第。其中「第三條：授讀書作文」即出現「國文」一詞：

先令知普通文字，及日常須知之文字，文句，文章，讀方綴字，及其意義。又用穩當言語字句，以養推辨思想之能，兼要啟發智德。

讀本之文章，總要平易而可為普通國文之模範，故採授兒童易理會，而令其心情快活純正者。又其所載事項，須用修身地理歷史格致，其他必

³ 有關日本「國語」意識之形成及其與「國文」學科建構的相關問題，詳見後文。

須日常生活而可添教授之趣味者。⁴

該章程實為 1892 年日本文部省頒佈的《小學校教則大綱》，所提到的「讀本」，就是小學校「讀書科」課程所使用的教本。譯文中的「普通『國文』」，乃為「本國文章」之謂；至於「其所載事項，須『用』修身地理歷史格致」，意謂文字作為各類知識的「載體」，因此它的教學，實以「應用」為主要考量。

此一「國文」的語彙及概念出現之後，立即為當時學界採納，如南洋公學即編訂《蒙學讀本》並且實際應用於課程教學之中。學者們據以形成「論述」的同時，也不無調整。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劉師培撰寫《小學校國文典問答》一書，目的即是以之「為小學校國文教課本」。其序言開宗明義，提出國文課之教學須以「字類」、「文法」為授課內容；⁵並從說明「國文」學科之必要性開始，逐一論述由「文字」而「文法」的學習次第，正是將日本「讀本」概念、當時新興的「文法」之說與中國固有的「小學」課程相連結。⁶次年，劉氏復於《中國白話報》刊出〈講教授國文的法子〉，則是在《國文典》問世之後，進一步指導教師如何講授國文。他除了再次說明識字的學習次第，同時還指出：「國文一科，可以參入各科裡面。就是地輿、歷史、倫理各科，也都可以兼教國文」，此與日本小學校的教學要旨聲氣相通，顯示當時蒙學的國文教學，同樣著重於匯通各學科，以利習得知識。⁷此一論述，隨著商務印書館

⁴ 〈日本小學校章程〉，《蒙學報》21 冊（1898 年 4 月），頁 41。

⁵ 劉師培〈國文典問答·序〉：「吾觀東西各國，國文設為專科，而教授之書，皆有一定課本。而吾中國之所謂文法者，則僅恃古人之文字而已，此其所以無規則也。不揣固陋，撰《國文典問答》一書，以分析字類為主，而以國文綴繫法繼之，庶世之閱者而有以知正名之不可苟與？」劉師培著，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揚州：廣陵書社，2008 年），上冊，頁 72-73。

⁶ 劉師培：〈國文典問答·第一章總論〉，《劉申叔遺書補遺》，上冊，頁 73-74。

⁷ 劉師培：〈講教授國文的法子〉，原載《中國白話報》第 14 期，教育，1904 年 7 月 3 日，署名光漢，後收入《劉申叔遺書補遺》，頁 269-271。按，當時由的蒙學教材以南洋公學所編訂的《蒙學課本》與《新訂蒙學課本》最具代表性，其文體皆為「淺近文言」。劉揭示文體須「以演白話為主」，與當時一般童蒙讀本有別，則是其改革趨新之處。

編印出版系列成套的《最新國文教科書》而深入人心。可見當時蒙小國文課程的性質偏於「應用」，應屬時人共識。據此，「國文」在蒙小階段的課程設置、課本編撰及相關論述的生成，大致於 1904 年前後，即已底定。只是，「國」與「文」在民族意識及文學或文化方面的特殊意義，還並沒有被刻意論及。

相對於蒙小教育多由民間有識之士熱心推動，「大學」教育必得由官方主導，其建制與發展，實相對複雜。作為諸多學校課程科目之一的「國文」，無論在名目訂定、課程設置，乃至於教材編纂方面，起步都較民間蒙小教育為晚，其內涵與性質，因亦隸屬「高等教育」而略有出入。光緒二十七年（1901）京師大學堂重建，同時暫充新式教育的最高行政機構，歷經王戌、癸卯學制，官方雖已有「大學」之規劃，但其體制，實與現今頗為不同。據《奏定章程·學務綱要》（1904），其高等教育為三級制，包括「高等學堂」（大學預科）、「大學堂」（大學本科）與「通儒院」（研究所），修業年限分別為預科三年，本科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而無論哪一級別，課程設置都沒有「國文」之目。「國文」作為高等學校的正式學科之一，最早出現在光緒三十三年正月（1907）清廷頒佈的女子師範學堂章程之中。該章程首先闡明：「女子師範學堂，以養成女子小學堂教習、並講習幼兒保育方法，以期於裨補家計、有益家庭教育為宗旨」，繼而揭示學科設置：

女子師範學堂之學科，為修身、教育、國文、歷史、地理、算學、格致、圖畫、家事、裁縫、手藝、音樂、體操。⁸

對於「國文」的學科要旨，則進一步規範如下：

在使能解普通之言語及文字，便能以文字自達其意，期於涵養趣味，有裨身心。其教課程度，先講讀近時平易之文，再進講讀經、史、子、集中雅馴之文，又時使作簡易而有用之文，兼授文法之大要及習字；並授以教授國文之次序法則。⁹

⁸ 〈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學科程度章第二〉，收入璩鑫堧、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頁 584。

⁹ 同前註，頁 586。

女子師範學堂的設置目的在「養成女子小學堂教習」，此一「要旨」，顯然是承納並配合當時民間蒙學教育中已經成形的、對於「國文」的學科理解與教學期待而來。

另一方面，《學務綱要》的其它各學堂章程雖無「國文」之目，卻有「中國文辭」或「中國文學」的修習要求，性質與「國文」近似。它大抵是被設置於大學的「預科」之中，進入本科之後，除非是文科專業，一般就不再修習。大學之所以設置「預科」，一則是參照日本學制；再則，新學制伊始，高等教育無法立即招收到合格的學生，只得經由「預科」先行培育，以為進入大學之預備；¹⁰ 因此，它與現今的高中教育大致相當。而《學務綱要》在明訂「高等教育」之「中國文學」課程的同時，亦敘明各級學堂循序而進之次第，並將「以資官私實用」作為各級學堂設置此一科目的重要目的：

今擬除大學堂設有文學專科，聽好此者研究外，至各學堂**中國文學**一科，則明定日課時刻，……各省學堂均不得拋荒此事。……其**中國文學**一科，並宜隨時試課論說文字，及教以淺顯書信、記事、文法，以資官私實用。……中小學堂於**中國文辭**，止貴明通。高等學堂以上於**中國文辭**，漸求敷暢，然仍以清真雅正為宗，不可過求奇古，尤不可徒尚浮華。

不過，由於預科的學生多已具備初小以上的語文基礎，其「中國文辭」之主要教育目標雖仍在「以資實用」，但亦同時提升為「保存國粹」：

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以便讀古來經籍。

中國各體文辭，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闡理紀事，述德達情，最為可貴。駢文則遇國家典禮制誥，需用之處甚多，亦不可廢。……且必能為中國各體文辭，然後能通解經史古書，傳述聖賢精理。文學既廢，則經籍無人能讀矣。外國學堂最重保存國粹，此即保存國粹之一大端。假使學堂中人全不能筆為文，則將來入官以後，所有奏議、公牘、書札、記事，

¹⁰ 參見何二元：《現代大學國文教育·緒論》，收入何二元編著：《現代大學國文教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2。

將令何人為之乎？

此一論述，被學者視為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的起點，也是大學語文教育的源頭。¹¹ 它的頒佈時間，恰在劉師培發表〈講授國文的法子〉一文之前不久。¹² 由此可見，大學語文教育與蒙小教育容或深淺有別，但以「讀書」（讀古來經籍）與「作文」（能為中國各體文辭）為要旨，仍是一氣相通。只是大學教育於「保存國粹」——也就是傳承固有文化方面尤須用心，則是與其它各級學校的差別所在。

正因為彼時的「保存國粹」須以「能為中國各體文辭，然後能通解經史古書，傳述聖賢精理」為前提，遂使得高等學堂以上的「中國文學」或「中國文辭」課程，必得要以研讀古典經籍、習作古典文體為主，這當然也就關涉到「以資實用」的「文體」選擇——在一個以「文言文」為主要交流應用文體的時代中，此一主張，自是理所當然。但當「現代」大學正式成立，新文學開始發展，「白話」逐漸取代「文言」而成為社會大眾的習用文體時，「大學」的國文教育目標與教材取舍要如何定位？其所關涉的問題，自然成為其後研議大學國文教學問題時的關注焦點。

（二）現代大學「大一國文」的定制及其關涉面向

放在中國近現代教育發展史的脈絡中來看，清廷於教育方面力圖改革，畢竟是迫於時局所需，實行上則力有未逮，無法全面推廣落實。官方的理念政策與各地方的實際作為，亦頗有差參；甚至於，往往因隨地方教育的既成現實而

¹¹ 參見何二元：〈學務綱要：學堂不得廢中國文辭〉（1904），收入何二元編著：《現代大學國文教育》，頁2。又，相關論述，還可更往前追溯至張之洞的〈致京張治秋尚書〉（1902）一文：「中國文章不可不講，自高等小學至大學，皆宜專設一門」。張之洞為癸卯學制的重要擬訂者之一，學制明訂自小學以迄大學皆須講授「中國文章」的理念，自應與此相關。

¹² 《學務綱要》頒佈於西元1904年1月13日；〈講授國文的法子〉發表於1904年7月3日。

調整改易。在「國文」之課程建制方面，《學務綱要》雖然並未明文規定設置大學「國文」科目，但就現存之清季「國文讀本」資料看來，至少原屬官辦的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當時即有以「國文」為名目之課程；¹³ 原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學堂，亦是如此。¹⁴

不過，如前所述，彼時的大學學制與現今不同，「國文」課程僅開設於相當高中教育的「預科」。因此，若論及「現代」大學之「大一國文」課程的設置及發展，自當要從預科制度取消之後的四年制大學開始。而這就有待於民國肇造之後，新學制的擬訂。

顯然，成立於南京的新政府對於教育制度及「國文」課程相當重視。民國伊始，即推出「壬子學制」（1912），將小學、中學、大學預科的「中國文學」統一名之為「國文」；「國文」作為各級學校的共同必修課程，至此遂得以明確規範。1922年，教育部復就學制予以調整（時稱「壬戌學制」），決定取消預科，延長中學教育年限，希望它具有大學教育的預備作用，¹⁵ 並在1929年8月頒佈的《大學規程》中，明訂定大學各科應修習的課程標準：

大學各學院或獨立學院各科，除黨義、國文、軍事訓練及第一第二外國文為共同必修科目外，須為未分系之一年級生設基本課目。

1938年，復就大學科目重新規範整理，將「國文」與「外國文」並訂為「基本工具科目」，且作出特別規定：

¹³ 二十世紀初，唐文治曾於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原南洋公學，1905年更名）講授國文課程，親編講義；1909年，他整理自己編寫的《高等學堂國文講義》，改名為《高等國文讀本》，交付上海文明書局出版發行，被視為中國「大學語文教材」之肇始。參見顧黃初編：《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38。

¹⁴ 參見歐陽軍喜：〈在中西新舊之間穿行：五四前後的清華國文教學〉，《清華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頁38-46。

¹⁵ 當時學界對於學制調整、「預科」存廢問題，曾有許多不同意見的討論，參見《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第三章〈壬子癸丑學制的修訂〉、第四章〈壬戌學制的醞釀、制定和施行〉，頁845-1070。

國文及外國文為基本工具科目，在第一學年終了，應舉行嚴格考試。國文須能閱讀古文書籍及作通順文字。……至達上述目標，始得畢業。

至此，現代大學之「大一國文」課程，遂正式得以確立。

然而，考諸當時的實際情況，新學制之推展卻並非盡如預期。受限於當時中學教育猶未完備，不少「大學」的生源及素質皆明顯不足，在現實情況無法配合之下，遂又不得不以特設「先修班」的方式，以供大學招生。因此直到國府遷臺之前，各地大學的「預科／先修班」或存或廢，學制狀況始終未能統一。即或如此，「現代」意義上的「大一國文」，仍在許多重點大學先後開設。它的設置目的，一說是因為預科取消之後，作為中學語文教育的延伸與銜接；但事實上，有鑑於當時大學生的語文程度不佳、文化素養不足，因而意圖以共同必修科目的方式進行補強，恐怕才是更關鍵的原因。¹⁶

而與此同時，萌興於晚清的啟蒙思潮、國語運動，與五四的以來的國語統一、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相結合之後，對長久以來書寫文體造成極大衝擊。更不提當時還另有廢漢字、倡行萬國新語等種種更為激烈的語文革命運動，這些體制內外的暗潮波濤洶湧，甚至危及「漢字」的存廢。¹⁷就「大一國文」的教學目標與教材編選而言，它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倘若課程的教育目標是「以資實用」，那麼，在一個即將進入以「白話」為主要應用語言的現代社會中，該課程的教學是否也應該以「白話文」為主要導向？怎樣的白話文訓練，才能符應於社會大眾對於大學（畢業）生的期待？若是旨在「傳承文化」，又是否要以「能閱讀古文書籍」為必要條件？所需要閱讀的，是什麼樣的古文書籍？

¹⁶ 這一點，由清華學堂轉型為清華大學過程中，各時期對於「國文」課程的討論，即清晰可見。參歐陽軍喜：〈在中西新舊之間穿行：五四前後的清華國文教學〉。

¹⁷ 從晚清開始，為求教育普及，民間即有多種不同的語文革命方案，其著眼點多在於漢字太過繁難，宜廢除，或改造，提出的方案包括使用拼音文字、簡體字、注音文字及拉丁化新文字等。詳參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黃曉蕾：《民國時期語言政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此外，「以資實用」與「保存國粹（傳承文化）」如何得兼？在它們彼此激盪匯流的過程中，國「語」與國「文」的游移辯證，將如何介入其中，並且積極發揮作用？當然，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是：作為現代國家的大學必修學科之一，它的「國」與「文」之間，具備了什麼樣的關連，二者之間，是否必然相生互涉？事實上，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現代大學，原是時代文化知識建構的重要場域，其國文課程的理念與實踐，每每著眼「文」的再塑造、再生產，自有超乎一般簡單的政治架構與意識形態之處。以下，即從教材選本之面向切入，就前述問題逐步探析。

二、四〇年代大一國文教材選本及其間的 「文／白」、「語／文」問題

教育部明令取消預科，於大學設置「國文」為一年級必修科目的時間在1929年8月；但由於各大學取消預科的時間不一，對於「大一國文」課程的想像與期待，也因當時外在環境、各校實際狀況與主事者的個人理念而有所出入，其間機括，或可於各校所編選的大一國文教材以見一斑。大致而言，三〇年代各校開設大一國文課程之情況尚不普遍，即或開設，所規定的學分數也未盡一致。據學者統計，截至1935年止，此一課程在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校都還未及設置；已開設的學校中，浙江大學2學分，廣西、山東大學4學分，清華大學、大夏大學、齊魯大學、安徽大學6學分，廈門大學和滬江大學則高達12與16學分。¹⁸ 修習年限，也有一年與兩年之別。其教材之編選，或為零篇講義，或為系統性選文，各有不同考量，當時並未引起太多討論。反而是抗戰爆發之後，國民政府高度重視高等教育之人才培育，遍地烽火之中，依然夤宮不廢，弦歌不輟，大學國文教育，亦因此備受重視。四〇年代，遂因此成為大學國文教育發展過程中，極其重要的一段時期。

¹⁸ 參見謝循初：〈今日大學課程編制問題〉，《安徽大學季刊》1936年第1期，頁1-14。

儘管彼時物力唯艱，各大學卻不僅以最堅強的師資陣容進行授課，¹⁹ 還大多自行編選教材，以利教學；甚至於，更有教育部統一編纂的國文選本問世。另一方面，甲午戰後割讓於日本的臺灣，在歷經殖民統治半世紀之後，日語幾乎已成為全島最主要的語文。1945 年抗戰勝利，國民政府隨即於臺灣大力推動「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臺灣的大學國文教育，自當與中國大陸方面有所不同。兩相參照，實可鑑照其間「語／文」問題的諸多複雜面向。而大學國文的教材選本，正提供了一個切入研究的極佳視角。

回到當時的教學現場，圍繞於大學國文的相關問題，大抵包括：課程本身與中學國文、預科國文之間的銜接與區隔、課程目標的訂定、選文原則、文白比例，以及寫作訓練該如何落實等。這些問題環環相扣，但大多輻輳、投射於所編選的教材選本之中。由於各方考慮的重點不一，遂因此引發諸多論辯。燕京大學、西南聯大、臺灣大學三校的校編大一國文教材，以及教育部頒行的部編《大學國文選》，正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個案。

（一）燕京大學選本：郭紹虞編選的 《近代文編》與《學文示例》

燕京大學是頗具盛名的教會學校，卻素來重視國文教學，國文課程不僅為大一必修，甚且還延續到大二。國文課教材包括「名著選讀」與「國故概要」兩部分，早自 1935 年起，即由多位教師合作編有一套四冊的《燕京大學國文名著選讀》，「分選學術論著，文學史，國學常識之文，及與各系特有關係之作而為中學所未及者」。編者以為近世及現代作者「於學術思想所關至重」，因此選入不少近代文章，諸如〈國學學刊序〉、〈國學學刊宣言〉等。²⁰

然而，當時任教於該校的郭紹虞（1893-1984）顯然並不滿意於此。郭對

¹⁹ 如當時西南聯合大學有朱自清、聞一多、羅常培、王力等，皆為名師。

²⁰ 參見李瑞山、陳振、鄒鐵夫：〈民國大學國文教育課程教材概說〉，《中國大學教學》2015 年第 8 期，頁 83-87。

於大一國文教學的主張向來是閱讀（思想訓練）與寫作（技巧訓練）並重，如何以具有體系性的方式為學生編選適當教材，尤為其所戮力者。1939年，他為燕大編選大一國文教材，²¹於1940年推出，頗受矚目。該教材分《近代文編》與《學文示例》二編，《近代文編》定位為「參考教材」，主要供閱讀之用；「以思想訓練為主而以技巧訓練為輔」；編選目的在「適合大生一般之需要，故所選文篇重在應用」。既重應用，則「自以不背現代生活為原則，爰以戊戌變政為中心，輯同光以來有關灌輸思想討論學術或研究生活之作，俾於講習之餘，兼收指導人生之效」。其選文包括李慈銘〈越縕堂日記〉、蘇曼殊〈嶺南幽光錄〉、譚嗣同〈記洪山形勢〉、劉師培〈論文雜記〉等，遍及日記、筆記、遊記、傳記、敘記、論說、論評、論辨、題序、書告、論述、疏證，凡十二體類。

《學文示例》主旨乃重在訓練寫作技巧，而以思想訓練為輔。其凡例有言：

欲使大學國文教學有較異於中學之方法，故略本修辭條例，類聚性質相同之文，理論實例同時並顧，俾於講授之外，兼有參考教材。

本書教材，文白互收，俾適於語言文字之訓練，韻散兼收，又蘄適合於文學的訓練。²²

全書架構以例為綱，計分「評改」、「擬襲」、「變翻」、「申駁」、「鎔裁」五大例，每例之中，又各有「理論之部」、「實例之部」，各收錄範文若干，以供學生摹習。如「評改」例的「理論之部」，編選劉勰《文心雕龍·指瑕》；「實例之部」，則有葉燮〈汪文摘謬〉、方苞〈古文約選〉等文。

所以如此，乃因為郭紹虞以為，「國文教學或重在思想之訓練，或重在技巧之訓練，原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不可偏廢」；因此分編二書，各有所重，卻適以相輔相成。²³與其它選本不同的是，為能暢言其編選旨趣，郭不僅以〈大

²¹ 據《學文示例·編例》，此一教材雖然由郭主編，但編纂過程中，仍然參酌了董魯安、凌敬言、鄭因百、楊弢甫、黃如文等教授的意見，「商討去取，頗得其助」。

²² 郭紹虞：〈編例〉，《學文示例》（上海：開明書店，1969年），頁1。

²³ 郭紹虞：〈大一國文教材之編纂〉，收入郭紹虞：《語文通論》（香港：太平書局，1978年），頁140-156。

一國文教材之編纂〉一文，為兩書之共同序文，說明編纂原委、二書關係，更分別為二書另行撰文以申言要旨。針對《近代文編》，他撰寫了〈新文藝運動應走的新途徑〉一文作為代序；而為了闡示《學文示例》中的諸多問題，甚且將自己歷年討論語文問題的相關文章結集成為《語文通論》一書，作為「《學文示例》的序」。此一情形，他自己在〈語文通論自序〉中也說：「為作序而寫成一部書，除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之外，我尚無所聞」，但仍著力於此，「只為編纂大學國文教本的恫趣有很多話要說，決不是一篇短序所能罄述」。²⁴

郭紹虞此舉，顯然是為了從根本上回應當時國文教學以及新文藝發展中的若干關鍵性論題，那就是：文言與白話之間的關係為何？如果說，訓練作文技巧是大一國文教學的重要目的，那麼，它應如何於當時的文白之爭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語文通論》一書涵括〈中國語詞之彈性作用〉、〈文筆再辨〉、〈中國文字型與語言型的文學之演變〉、〈新詩的前途〉等多篇論文，用郭紹虞自己的話來說，它們都是根據中國語言文字的特性，去討論「語體」與「文體」的問題，從而「得到解決國文教學的方案」。它的體例新穎，組織架構井然，問世之後，頗獲好評。²⁵ 只是，在一個白話語體已經日漸成為當時之語文主流的時代中，此一以「學文」為旨趣的教材選文，絕大多數仍屬文言，難免引發疑慮。如朱自清雖認為「郭先生編《學文示例》這部書，搜採的範圍很博，選擇的作品很精，類列的體例很嚴，值得我們佩服」，但對其中白話選文極少，仍不無微詞：

書中白話的例極少，這是限於現有的材料，倒不是郭先生一定要偏重文言；不過結果卻成了以訓練文言為主。所選的例子大多數出於大家和名

²⁴ 郭紹虞：〈語文通論自序〉，收入郭紹虞：《語文通論》，頁1-4。

²⁵ 如朱遜：〈介紹《學文示例上冊》〉即對它採「示例」方式，讓學者能夠「舉一反三」頗多讚譽，《國文雜誌》1943年第1卷第4、5期合刊，頁38-39。張長弓：〈讀《學文示例》〉也以為它「係有組織有結構的著作，是以『比較』金線，貫穿各種文體，提起來成就一串瑣鏈」，《教育函授》第1卷第1期（1948年1月），頁18-19。

家之手，精誠然是精，可是給一般大學生「示例」，要他們從這裡學習文言的技巧，恐怕是太高太難了。至於現在的大學生有幾個樂意學習這種文言的，姑且可以不論。²⁶

誠然，當時白話文體仍處於發展階段，能夠選擇的文本不多，這正是「限於現有的材料」。不過，大學國文是否需要選錄白話文作為教材，主要的原因，應該不完全是材料的多寡，而是關乎於主事者的編選理念與教育目標。參照當時教育部統籌編選的《大學國文選》，與西南聯大白編的《國文選》，正可看出其間的歧異處。

（二）教育部選本：《部定大學用書·大學國文選》

四〇年代伊始，為解決戰時教科書編製、印刷與運輸方面的困難，教育部遂取消過去一直沿用的「審定制」，改為「部定制」；同時為了宣揚固有文化與民族精神，凝聚民心士氣，也統籌組編教科書。1940年夏，教育部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決定編選大學國文全國統編教材，推選魏建功、朱自清、黎錦熙、盧前、伍倬儻、王煥鑣六人負責編選，並由魏建功擔任召集人，總責其事。

該選本名為《部定大學用書·大學國文選》，在廣蒐資料，共同研議多時之後，於1942年公告頒佈篇目，1943年由國立編譯館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出版，正中書局印行。選目凡五十目，六十篇，全為經典文言文，依經史子集四部次第排列。書前有教育部長陳立夫為序，首先點出：「文化以積累而彌富，著作亦閱世以滋多」，然而文海浩瀚，限於日力，故必得精選別擇，以示為學之津梁。既而敘明大一國文作為共同必修科目，以及必須編定選本之原因：

大學一年級之國文學程為共同必修科目，所以養成學者理解載籍之能力，與運用文字之技術，以期漸進而闡揚固有之精粹者也。……教材無妨其從同，進度乃臻於一致。爰聘專家，加詳選擇，沿波討源，垂條立

²⁶ 朱自清：〈中國文的三種型——評郭紹虞編著的《學文示例》〉，《清華學報》第14卷1期（1947年10月），頁167-173。

幹，歷代著錄，其名篇大家，亦嘗其一驚，庶幾流變可知，體裁有別，觀瀾於海，是在學人。

其後另有〈大學國文選例言〉，說明編訂要旨有三：

1. 在瞭解方面，養成閱讀古今專科書籍之能力。
2. 在欣賞方面，能欣賞本國古今文學之代表作品。
3. 在修養方面，培養高尚人格，發揮民族精神，並養成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之觀念。

參照 1938 年教育部將大一國文定位為「基本工具科目」，並以「閱讀古文書籍及作通順文字」為通過標準，此一教材在編選旨趣方面顯然有所突破。首先，它雖然承襲了過去國文教學重在培學生「閱讀」能力的一貫要旨，但已不限於古文書籍，而將範圍擴及於「古『今』」作品（雖然此一選本實際上並沒有選任何一篇白話範文）。其次，增加「欣賞」與「修養」兩項目，尤其「修養」方面，不只「愛國家、愛民族」，還要有「愛人類」的觀念，明顯擴大了國文教育的涵蓋面向。

然而，五十目選文之中，全數皆為文言，且先秦兩漢選文即有二十餘篇，所佔比例尤高，幾達二分之一。選錄之篇什，包括《易》之〈乾〉、〈坤〉、〈文言〉；《書》之〈秦誓〉；《詩》之〈氓〉、〈蒹葭〉、〈七月〉、〈東山〉；《禮記》之〈禮運〉、〈樂記〉；《左傳》之〈穀之戰〉、〈鞏之戰〉、〈季札觀樂〉等，以經史類居多。時代最晚近的，則是姚鼐的〈與魯絜非書〉。由於選文復古傾向濃厚，文體分佈也並不均衡，從頒佈之初，就引發不少爭議，《高等教育季刊》甚至為此製作「大學國文教學特輯」，朱光潛、朱自清、魏建功、黎錦熙、阮真、陳延傑等學者紛紛各抒己見，甚至彼此論辯；向來關注國文教學的《國文月刊》、《國文雜誌》，就此也有相關討論，大學國文的教學目標、教材編選，以及其所內蘊的文白之爭等問題，以此益形凸顯，並備受關注。

檢視相關爭議，最初乃是由朱光潛首發其端，他的主要論點在於：

大學國文不是中國學術思想，也還不能算是中國文學，它主要的是一種

語文訓練。……

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他起碼就應有用中國文閱讀和寫作的 ability，大學國文就應懸訓練閱讀和寫作兩種能力為標準。

更何況，就閱讀而言，中國古籍深奧難解者甚多，非日積月累無法窺其堂奧，因此他以為：

我們不能希望大學生對於這須循序漸進的工作可一蹴而就；我們只希望他們藉有註解而讀群經諸子，不藉註解而讀兩漢以後散文而略懂其大義的能力。……我們不能希望一般大學生能寫高深古雅的詩詞歌賦和古文，能固然好，不能也無妨，我們能希望他們能用淺近文言或國語寫公私信，做學術論文，敘述時事或故事，描寫眼見耳聞的人物，寫得辭明理達，文從字順，我們所懸的大學國文教學的目標不應低於此，也不必高於此。

為此，他提出「立本」與「示範」兩條路徑，前者重在閱讀，以小學與文法為基礎，進而蘊積學理，以期厚積薄發；後者則「純從文章的規模法度技巧諸方面著手」，精選範文，「使學者熟讀爛嚼口誦心維，從裡面討些訣竅」，進而有助於寫作能力之精進。儘管二者相互為用，但朱光潛認為：「國文在一年的短促期限裡決談不到立本。立本是大學以前的事和大學本科諸專門科目的事，我們決不能希望在寥寥數十篇模範文中求立本。但為示範起見，如果選得精，講得好，讀得熟，習作得勤，寥寥數十篇模範文就很可夠用」。也因此，「寫作比閱讀重要」；而在白話文日漸普及，大學多數學生都在使用白話文寫作之際，對於部訂《國文選》「竟不選一篇白話文範作，我百思不得其解」。²⁷

對於朱光潛的批評，編輯委員朱自清、魏建功與黎錦熙都紛紛撰文予以回應。如朱自清〈論大一國文選目〉一文，便對大學國文主要作為語文訓練一事，提出不同意見：

²⁷ 朱光潛：〈就部頒《大學國文選目》論大學國文教材〉，《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頁49-52。

大學國文不但是一種語文訓練，而且是一種文化訓練。朱先生希望大學生的寫作能夠「辭明理達，文從字順」；「文從字順」是語文訓練的事，「辭明理達」，便是文化訓練的事。²⁸

在朱自清看來，「文化訓練」其實也就是朱光潛所謂的深一層的「立本」，這雖然不是國文這一科目的責任，但國文也該分擔起這個責任。教材若能今古兼及，並以「重今的選本」將文化訓練與語文訓練合為一事，固然最為理想，但畢竟一年的時間有限，而中小學的國文教學，原就以白話文與唐宋以降的文言文本為主，大學國文多選秦漢文，不外乎是為求區隔與提昇之故。

魏建功既為主其事者，自然更是有話要說，不吐不快。部訂本完成後，他首先撰寫了〈大學一年級的國文問題〉，說明編纂原委、編訂過程、選文標準，以及它與高中國文教學的關聯；看到朱光潛的文章之後，又以〈答朱孟實先生論大一國文教材兼及國文教學問題〉一文回應。魏建功呼應朱自清之論，他認為：

大學國文內容方面也是中國學術思想，也是中國文學，而形式方面主要的是語文訓練。著眼不同，說法也將不同。……一個國家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對於他自族語文所表現的一些形式和內容應該有知道而懂得的義務。……「示範」一義，如只限於發表寫作「能」的訓練，我們覺得是大學標準程度下墜的現象；我以為大學國文已不限於「能」而必及於「知」的訓練，所有選文應是兩重示範的作用，——形式和內容雙方兼有之。²⁹

魏建功所說的「形式」和「內容」，其實大致相當於朱光潛所提出的「示範」與「立本」，但語意更為清楚。只是如此一來，很容易讓一般人產生「內容」為重，「形式」為輕的誤解。即以部編本的選文考量與教學目標設置而言，

²⁸ 朱自清：〈論大一國文選目〉，《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頁53-55。

²⁹ 魏建功：〈答朱孟實先生論大一國文教材兼及國文教學問題〉，《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頁56-61。

恐怕也都不免有「重內容，輕形式」的取向。據魏建功所言，部訂選本的編選要旨，除了前引〈例言〉中所明列的了解、欣賞與修養三者之外，原本還有一項是：「在發表方面，能作通順而無不合文法之文字」³⁰——也就是包含寫作訓練。然而最後定稿，卻刪去此一項目，其原因，即在於魏建功以為，從初高中以來，國文課程都在訓練學生熟悉運用本國語文的技能，大一已是修習國文的最後一年，若致力於單純的語文訓練，未必能獲致具體成效。因此，他認為朱光潛所提出的「立本」與「示範」兩個途徑，大學與中學應該共同分擔其責任而略有輕重：

從小學到中學「示範」的責任大些，大學裡該在「立本」的意義重些。

我們議訂篇目是把四個教學目的中間的了解欣賞修養三方面綜合起來編選的。³¹

再者，關於文、白問題，魏建功也以為：「文言」、「白話」只是工具的組織（文法）不同，發表的技巧初無二致。由此，或許也就不難理解，部編《大學國文選》之所以全為古文，且以先秦兩漢文居多，正是因為它原就以「立本／內容」為先，並不十分期待學生據此去琢磨寫作技能的緣故。

不過，對於照於陳立夫為此一選本所撰寫的序文，部訂本的編選理念與實際選文顯然是有一定差距的。據陳立夫所言，大學一年級以國文為共同必修科目，目的在於「養成學者理解載籍之能力，與運用文字之技術，以期漸進而闡揚固有之精粹」。據此，「閱讀（理解載籍）」、「寫作（運用文字）」與「傳承文化（闡揚固有之精粹）」原應兼容並重。然而編委會實則重閱讀而輕寫作，它的選文，更是與時代語境頗有距離，不易引發學生學習欣賞的興趣，推出之後，普遍反應不佳，各大學也未必全數照表操課，因此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相對地，反倒是西南聯大自編的國文教材與國文教學風格獨具，讓學生難以忘懷。即使多年之後，當時課程點滴，仍不時出現於學子們的各類追憶文字之中。

³⁰ 見魏建功：〈大學一年級的國文問題〉，《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頁32-48。

³¹ 魏建功：〈答朱孟實先生論大一國文教材兼及國文教學問題〉。

（三）西南聯大選本：《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 與《大一國文習作參考文選》

西南聯大是抗戰時期由當時的北大、清華、南開在雲南昆明共同組成的大學，1938 年正式成立，1946 年結束，雖然為時不過八年，然而戰時師生共體時艱，戮力於斯文的精神，已成為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則傳奇。當時校內的大一國文，亦以其獨具隻眼的課程選材，對學生處世態度與文學品味的養成，造成深遠影響。

西南聯大的大一國文課為全校一年級學生共同必修，校方對此極為重視。從 1938 至 1942 年期間，特別為此組成「大一國文編撰委員會」，由楊振聲（1890-1956）擔任主任委員，朱自清、浦江清、羅庸等人共同參與，編訂了一部《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作為課程教材。該教材發動全體任課教師推薦篇目，幾經斟酌討論，並採「邊用邊修訂」方式，在使用中不斷增刪，至 1942 年定稿。它前後有三個不同版本，大同而小異，最後一個版本完成於 1942 年，包括 15 篇文言文、11 篇語體文、44 首詩、1 篇附錄。現今所見的版本，主要是第二次的修訂版，選文分上中下三編，上編為古文，以史傳和序記為主；中編基本上都是語體時文，選入胡適、魯迅、周作人、徐志摩等反映新文學運動實績的現代文學作品，體類涵括散文、小說，戲劇劇本與文學理論等；³² 下編則為古詩詞，以唐宋為主。³³ 初步看來，將大量的新文學語體文名篇選為教材，應是它最大的特色所在，甚至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舉」。³⁴ 但事實上，它

³² 如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郁達夫〈薄奠〉、陳西滢〈閒話〉、丁西林〈一只馬蜂〉、朱光潛〈文藝與道德〉、魯迅〈我怎麼做起小說來〉等。

³³ 學者劉東、吳耀宗即根據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之此一版本予以整理出版，見《西南聯大國文課》（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 年）。

³⁴ 見楊起、王榮禧：〈追思楊振聲先生〉，李宗剛、謝慧聰選編：《楊振聲研究資料選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317-319。

在選錄古典詩文方面的慧眼與用心，同樣值得注意。其精彩獨特之處，或可由汪曾祺〈晚翠園曲會〉一文的描述略見一斑：

聯大的大一國文課有一些和別的大學不同的特點。一是課文的選擇。

《詩經》選了〈關關雎鳩〉，好像是照顧面子。《楚辭》選〈九歌〉，不選〈離騷〉，大概因為《離騷》太長了。《論語》選〈冉有公西華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不僅是訓練學生的文字表達能力，這種重個性，輕利祿，瀟灑自如的人生態度，對於聯大學生的思想素質的形成，有很大的關係，這段文章的影響是很深遠的。聯大學生為人處世不俗，誇大一點說，是因為讀了這樣的文章。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選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

魏晉不選庾信、鮑照，除了陶淵明，用相當多篇幅選了《世說新語》，這和選〈冉有公西華侍坐〉，其用意有相通處。唐人文選柳宗元〈永州八記〉而捨韓愈，宋文突出地全錄了李易安的〈金石錄後序〉。……白話文部分的特點就更鮮明了。魯迅當然是要選的，哪一派也得承認魯迅，但選的不是〈阿Q正傳〉而是〈示眾〉，可謂獨具隻眼。選了林徽音的〈窗子以外〉……林徽音的小說進入大學國文課本，不但當時有人議論紛紛，直到今天，接近二十一世紀了，恐怕仍為一些鐵杆左派……所反對，所不容。但我卻從這一篇小說知道小說有這種寫法，知道什麼是「意識流」，擴大了我的文學視野。³⁵

參照於先前之國文課程目標的設訂，無論是「以資應用」、「文化傳承」，抑是思想與寫作訓練，總不免於經世致用的取向。然而汪曾祺這段文字所披露出的訊息，卻極其不同尋常。且不說，《論語》選錄〈冉有公西華侍坐〉，投射出「重個性，輕利祿，瀟灑自如的人生態度」；即使是林徽音的小說〈窗子

³⁵ 汪曾祺：〈晚翠園曲會〉，《汪曾祺全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98年），卷六，頁207。

以外〉，所達致的教學效果，也絕不止於制式的寫作訓練，而是擴大了學生的文學視野，啟發了文學創作的興趣。

除此之外，檢視此一《國文選》所選錄的篇章，它始以《論語》十章，先秦兩漢文只選了《左傳·鞏之戰》、《戰國策·魯仲連義不帝秦》、《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漢書·李陵蘇武傳》；之後便是《三國志·諸葛亮傳》與《世說新語》。《世說》首選過江諸人「新亭對泣」一則，或許不無特定的時代因素考量，但是之後的「桓公北征」、「簡文入華林園」、「支道林養馬重其神駿」、「嵇中散臨刑奏廣陵散」、「王子猷雪夜訪戴」，以及《人間詞話》選錄「造境與寫境」、「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與「人生三境界」等段落，皆可說是別出於其它選本的「獨具隻眼」之作。顯然，擺落功利實用的目的，轉而關注美感意趣、人生境界，自當是它最值得稱道之處。不少聯大學生畢業多年之後，仍津津樂道於當年國文課程的點滴，更是凸顯出教材選文與學生人生態度、思想素質養成之間的關聯。

此外，聯大重視白話文教學，但當時多數教師不擅於此，因此在課程師資安排方面，「教授專教語體文（白話文），教員、助教講授文言文，這樣既表示對現代文學作品的重視，也解決語體文不易教的難題」。³⁶ 1944年，聯大又編選了一冊《大一國文習作參考文選》（後改名為《語體文示範》），更是純為白話文選。³⁷ 所以有此編之選，主要的原因正是針對教育部的部訂《大學國文選》而來。如前所述，教育部在1942年10月頒布了一份「大學國文選目」，

³⁶ 見楊起、王榮禧：〈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楊振聲先生在昆明〉，李宗剛、謝慧聰選編：《楊振聲研究資料選編》，頁325-331。

³⁷ 該文選所選的文章包括：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魯迅〈狂人日記〉、〈示眾〉、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死城〉、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朱光潛〈文藝與道德〉、〈無言之美〉、梁宗岱〈歌德與李白〉、〈詩、詩人、批評家〉、謝冰心〈往事〉、林徽音〈窗子以外〉、丁西林〈壓迫〉。選文篇數並不多，其中所選的胡適、魯迅、徐志摩、冰心、林徽音、朱光潛之作，大致同於先前的《國文選》；另新選入宗白華、梁宗岱的文學論述，丁西林的戲劇選文則由原先的〈一只馬蜂〉改為〈壓迫〉。

訓令全國高校採用。該選目全屬古典篇什。聯大的國文教師對此深不以為然，認為它完全無助於學生習作，故而另選此編，作為國文教學之輔助。為此，楊振聲特別撰文為序，敘其原委；文中主張：「近代的文明國家，沒有不是語文一致的」，「只有記載活語言的文字才是活的，因為它與語言共同生長」。現代大學生各有其學科專長領域，無法殫精竭力於學習古文，未來也不會使用古文寫作，故應讓學生「以確切的語言接受知識，更以確切的語言表達出來」。而這個「確切的語言」，即是語體白話文。因此，全文最後特別強調：

歐洲的近世文明，誰都承認是起源於文藝復興。而文藝復興的基本精神是敢於承認現代，敢於承認自己的思想與情感，敢於以現代的語言表示現代人的思想與情感，其實這也就是希臘的精神，也就是吾國周秦諸子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才有現在，才能充實現在而創造將來。……讓我們繼承古人的精神，不要抄襲古人的陳言；讓我們放開眼光到世界文學的場面；以現代人的資格，用現代人的語言寫現代人的生活，在世界文學共同的立場上創造現代的文明。³⁸

楊振聲是「新文學」的重要推手，從任教於清華大學開始，多年來一直致力於讓新文學教學進入大學課堂，此一序文的立場鮮明，自不令人意外。《習作參考文選》從現實面考量，強調「語體文」習作訓練之於現代大學生的必要性，亦有其說服力。雖然，隨著抗戰勝利，聯大解散，聯大的《國文選》與大一國文課亦成絕響。然而它古今兼顧的選文原則、重視白話語體文之教學與習作的教學理念，卻不僅未見中輟，反而開枝散葉，在戰後的北京大學、臺灣大學等校綿衍流盪。

1948年，復員後的北京大學出版包含上中下三卷一冊的《北京大學國文選》，下卷全為白話文選，選文包括魯迅〈狂人日記〉、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林徽音〈窗子以外〉等，便明顯承襲了先前聯大國文教材的風格特色。

³⁸ 楊振聲：〈新文學在大學裡——大一國文習作參考文選序〉，《國文月刊》28、29、30期合刊（1944年11月），頁2-3。

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大陸的國文教材編選與教學理念驟然丕變，原先國文課程念茲在茲的語言文學、文化思想等關懷，若非蕩然無存，便是轉向為黨意與意識型態服務。1949年，新華書店出版由北大與清華合編，華北教育部教科書審定的《大學國文（現代文之部）》，大量選入毛澤東、劉少奇、陳伯達、周揚等人文章，毛澤東的文章更是選錄了四篇之多。³⁹其要旨，由葉聖陶所撰寫的序文即可見一斑。⁴⁰195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郭紹虞與吳文祺、章靳以三人合編的《新編大一國文選》，開篇便是毛澤東的六六文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其它選文多配合中共一年中的各項「節目」，如史倩之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等；⁴¹凡此，都可見其質變之處。相形之下，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大一國文教學與教材選本，毋寧更值得注意。原因是：一則，它承續民初以來國文教學一貫的理念與關懷而有所轉化；再則，臺灣曾為日本殖民半世紀之久，其間「國『語』」與「國『文』」的問題亦因日本語文之介入而益形複雜。

³⁹ 該選本之選文凡34篇，開篇即是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隨後依序為毛的〈毛澤東論學習〉、〈《農村調查》序言二〉、〈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劉少奇〈人的階級性〉、陳伯達〈「五四」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道路〉、周揚〈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

⁴⁰ 葉聖陶以〈大學一年級國文的教學目標和學習方法——《大學國文（現代文之部）》序〉一文說明該選本的編選要旨：我們選材的標準不約而同。那些懷舊傷感的，玩物喪志的，敘述身邊瑣事的，表現個人主義的，以及傳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違反時代精神的作品，一概不取。入選的作品須是提倡為群眾服務的，表現群眾的生活跟鬥爭的，充滿著向上的精神的，洋溢著健康的情感的。我們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內容適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要求，希望對於讀者思想認識的提高有若干說明。就文章的體裁門類說，論文、雜文、演說、報告、傳敘、速寫、小說，都選了幾篇。這些門類是平常接觸最繁的，所以我們提供了若干範例。參見葉至善、葉至美、葉至誠編：《葉聖陶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3卷，頁161-168。

⁴¹ 見郭紹虞、吳文祺、章靳編：《新編大一國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50年），〈編後記〉。

（四）臺灣大學選本：魏建功的《大學國語文選》 與許壽裳的《大學國文選》

1945 年抗戰勝利，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後，隨即致力於「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當時銜命由大陸來臺從事文化重建與大學教育的主要人員，如許壽裳（1883-1946）、魏建功（1901-1980）、臺靜農（1903-1990）、毛子水（1893-1988）、洪炎秋（1902-1980）等，皆先後執教於臺灣大學中文系，並且主導推動全校國語文教育。臺灣大學由日本帝國大學改制而來，是戰後臺灣第一所國立大學，在高等教育界動見觀瞻，此一時期的臺灣文化重建工作與臺灣大學的語言文學教育相應互通，既體現了「語言」、「文學」與「教育」之間不容忽視的密切關聯，也凸顯出臺灣大學在戰後臺灣文化與教育場域中的特殊地位。以當時魏建功編選的《大學國語文選》與許壽裳主編的《大學國文選》相互參照，適可見出其間機括。

由於曾經日本殖民半世紀之久，戰後初期臺灣主要交流溝通的語言，既非國民政府所訂定的「國語」，亦非臺人先前所習用的閩語或客語，而是日本語。據當時師生所述，戰後初期臺大校園中的語言情況是：「學生受的皆是日本教育，不通中文」，上課時，各學院的老師們「非精通日語，無法上課」；醫學院甚至還用德文解說。⁴² 學生之間，每每也因語言不通，產生溝通上的困難。⁴³ 大學的「國文」教學該如何進行，無疑是教學者的一大挑戰。許壽裳於 1947 年接任中文系主任，隨即展開多項推動校內國語文教育的工作。⁴⁴ 1948

⁴² 見葉曙：〈我所認識的八位臺大校長〉，《閒話臺大四十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7。

⁴³ 據當時就讀臺大的外省籍學生張以淮所述，「本省同學有的臺灣話都不見得講得好，更不要說是國語了；所以溝通上相當難。」見〈陣陣春風吹麥浪〉，收入藍博洲：《麥浪歌詠隊》（臺北：晨星出版社，2001 年），頁 49-50。

⁴⁴ 據臺大校刊記載，「本院中國文學系，特別注意國語之推行，國文之教學，對本省學生不問院系，每週皆授以國語三小時，國文五小時，務使其在寫說上，能自由表

年2月7日，許壽裳以中國文學系主任身份召集臺大校本部及法、醫學院全體國文國語教師，暨系中其他教授召開國語國文教學會議，會中除決定「全校大學一年級國文第二學期依程度重行分組，以利教學」之外，再次確認「全校各院國文國語採用同一教材，即國文採用本校選印之《大學國文選》，國語採用本校選印之《大學國語文選》」；全校國語文課程，自此趨於定制。⁴⁵

《大學國語文選》由時任臺大中文系教授的魏建功編選，吳守禮注音，於1947年12月10日正式出版；無論是整體架構抑是個別選文考量，都顯示了它的別開生面與別有用心之處。它的主要理念大致有三：一、「語文復原」；二、由「方言」而「國語」；三、「由『語』而『文』」，以此與《大學國文選》相互為用。選本一開始，魏建功即以〈國立臺灣大學一年級國語課程旨趣〉一文，明敘它的編選旨趣，及其與既有之「國文」課程的關係：

本大學為應臺省學生需要，開設國語課程，與國文課程相輔為用，主旨在使學者能——（1）認識國字，（2）正確讀音，（3）流利應用標準語。

「說」「讀」在國語課程佔重要地位，「寫作」「欣賞」歸到國文課程裡，但這裡也不能不顧到。同樣，國文課程對於「說」「讀」，並不比「寫作」「欣賞」可以輕忽了多少。本大學為了特別需要，在語文復原的意義上，把國文多分出一部分來叫做國語而已。⁴⁶

選文方面，全為白話語體，共計二十目，「備與發音、會話同時並進」，分「故事」、「對話」、「小說」、「戲劇」、「歌謠」、「演說詞」、「文」七大類，每類選目之後，都簡要說明其特定考量及相對應的教學目標，綱舉目

達，無所隔閡。又特設文學院圖書閱覽室，陳列現代中國各種書籍及報章雜誌，以便學生隨時閱讀，而獲進步。為求適合本省學生的需要，特新編印國文及國語教本，並以注音教授標準國語」。《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5期第5版（1947年12月1日）。

⁴⁵ 《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9期第1版（1948年3月1日）。

⁴⁶ 魏建功：〈國立臺灣大學一年級國語課程旨趣〉，魏建功、吳守禮編：《大學國語文選》（臺北：臺灣大學教務處，1947年），頁1-5。

張，自具體系。此一做法，不僅是國語文教材編選者之創舉，同時也凸顯出選文背後，編者的理念、學術背景，以及當代語境的特殊性。

由於此一選本我已另有專文探討，⁴⁷ 除以上之必要概述外，其餘不再細論，以下僅針對最近才重新被「發現」的《大學國文選》略作說明。

據早年文獻，《大學國文選》由許壽裳編選，因選入不少左翼作家作品，國府來臺之後被列為禁書，始終不見於世。唯據當年許壽裳所遺留的殘缺手稿，大略得知選文至少包括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胡適〈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以及魯迅的〈吶喊自序〉、〈狂人日記〉等。⁴⁸ 直到 2012 年，有熱心校友將其所收藏之舊日課本捐贈臺大總圖，才使人得以窺其全貌。印製成書的《大學國文選》選目不僅與先前許壽裳的手稿略有出入，前後更有兩個不同版本，編選者之署名皆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它們分別是 1947 年 9 月的初版與 1948 年 10 月的改訂版。相互參照，其間的改易之跡，頗值得留意。以下姑以表列方式，呈顯手稿、初版與改訂版之間的出入：⁴⁹

排序	手稿	1947 年成書初版	1948 年改訂版
1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蔡元培）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蔡元培）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蔡元培）
2	四十年前之小故事（吳敬恆）	△四十年前之小故事（吳敬恆）	*文學革命論（陳獨秀）
3	知難行易（孫文）	△知難行易（孫文）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胡適）
4	文學革命論（陳獨秀）	*文學革命論（陳獨秀）	中國文字不進步底原因（許地山）
5	◎為學與作人（梁啟超）	歐遊心影錄楔子（梁啟超）	復古的空氣（聞一多）

⁴⁷ 參見梅家玲：〈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魏建功與臺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7 期（2010 年 2 月），頁 125-160。

⁴⁸ 同前註。

⁴⁹ 前有「◎」者為手稿獨有，加「△」者為手稿與初版皆選，而改訂版未選錄者，加「*」者為手稿、初版、改訂版皆選錄者；加「★」號者為手稿所無，但初版即選錄而改訂版亦繼續收錄者。

6	論文章作用（梁啟超）	△論文章作用（梁啟超）	亡友夏穗卿先生（梁啟超）
7	◎新民說（梁啟超）	△與黎錦熙羅常培書（錢玄同）	文人宅（朱自清）
8	吶喊自序（魯迅）	△讀書（胡適）	自然（豐子愷）
9	狂人日記（魯迅）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胡適）	*吶喊自序（魯迅）
10	與黎錦熙羅常培書（錢玄同）	*吶喊自序（魯迅）	*狂人日記（魯迅）
11	讀書（胡適）	*狂人日記（魯迅）	★一個人在途上（郁達夫）
12	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胡適） ⁵⁰	★一個人在途上（郁達夫）	由日本回來了（郭沫若）
13		薄奠（郁達夫）	★秦嶺之夜（茅盾）
14		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茅盾）	十月十七日（巴金）
15		★秦嶺之夜（茅盾）	★淪陷的北平中秋（老舍）
16		濟南的冬天（老舍）	黃蓋密獻苦肉計（羅貫中）
17		★淪陷的北平中秋（老舍）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施耐庵）
18		八百壯士（巴金）	★劉老老游大觀園（曹雪芹）
19		藝術二昧（豐子愷）	★添四客述往思來（吳敬梓）
20		圖書與人生（豐子愷）	★明湖居聽書（劉鶚）
21		給亡婦（朱自清）	秋水 莊子（莊周）
22		漿聲燈影裡的秦淮河（朱自清）	楊朱 列子（列禦寇）
23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俞平伯）	淮陰侯列傳 史記（司馬遷）
24		談學問（朱光潛）	李廣蘇建傳 漢書（班固）
25		侵略者的失敗（常乃惠）	郭太傳 後漢書（范曄）
26		青島（聞一多）	諸葛亮傳 三國志（陳壽）
27		武松打虎和李逵殺虎（施耐庵）	典論自序（曹丕）
28		★劉老老游大觀園（曹雪芹）	文選序（蕭統）
29		★添四客述往思來（吳敬梓）	養生論（嵇叔夜）
30		★明湖居聽書（劉鶚）	長恨歌傳（陳鴻傳，白居易撰歌）

⁵⁰ 原手稿作「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應是筆誤。

對照之下，原先半頁手稿中的選目，多數在初版中被保留，調整不多；推判初版《大學國文選》之編選，乃由許壽裳主持其事，應無疑義。此一版本最大特色，在於所選篇什雖然兼括古今，但所選之四篇古典文學皆為白話長篇小說中的段落，亦為語體文之一種，因此雖為國「文」選，仍與魏建功所選的國「語」文選較為接近，屬於配合當時臺大學生語文程度的選本。它也同時呼應了魏建功在〈國立臺灣大學一年級國語課程旨趣〉中所說的：臺大的國語課程，實與國文課程相輔為用，二者皆兼顧「說」、「讀」、「寫作」與「欣賞」，只是各有偏重，並且「把國文多分出一部分來叫做國語而已」。

然而時隔不過一年，改訂版的選文卻出現極大更動。三十篇選文，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各為十五篇，其中更不乏《莊子·秋水》、《列子·楊朱》、《史記·淮陰侯列傳》、《漢書·李廣蘇建傳》等先秦兩漢的子史之文。從時序看來，改訂本出版於1948年10月，許壽裳先生則是在同年2月18日即因意外辭世，從該年3月至10月之間，臺大中文系主任由喬大壯而臺靜農，它的大幅改訂，或許是因為主事者易人，編選主張遂因此改易；但更有可能的是，它不僅落實了當時「由『語』而『文』」的語文教學理念，同時也是朝向民國以來「大學國文」教育理念的回歸：只要大學生具備了一定的語文基礎，高等教育，終究是必須要藉由研習文言文，以達致更高一層次的、「傳承文化」的目的。

三、「國」與「文」：四〇年代大一國文選本中的 國族意識、文化想像與語文形構

四〇年代是「大一國文」課程在現代大學正式設置並充分發展的重要時期，前文所論述的諸選本，不僅各有其代表性意義與重要性，經由它們相參互照，更凸顯不少問題，有待進一步研析。其中：郭紹虞、朱自清與魏建功，先後都曾主事過不同教材的編選，但所呈現出的編選理念與所選錄的篇什卻大相

逕庭，⁵¹箇中原因固然耐人尋味；各選本因「國族意識」、「文化想像」與「語文形構」之相互交涉而產生的種種複雜糾葛，毋寧更值得關注。

首先，就「國族意識」與「文化想像」而言，「國文」一詞原就是由「國」與「文」組構而成，然而這兩者的具體內涵為何？它們是否，以及，如何落實於「國文」，特別是，「大一」的國文課程之中？這些問題，在此前的國文教材編選過程中雖多少有所觸及，卻並不凸顯。然而，戰後初期臺灣以日語為主的語文環境，以及國民政府亟欲藉由語文教育將「日語臺灣」全面翻轉成「國語臺灣」的決心，則不僅因為中日語文在戰後臺灣社會的正面交鋒，凸顯出「國／語文」之於「現代國家」建構的必要性，更因為當時臺灣國語文教育不僅須在極短時期中從無到有，還必得要「語」、「文」兼顧。它的實踐之道，正所以揭示「國語」與「國文」之間既相互形構，又游移辯證的動態關係。以下，即以魏建功、許壽裳來臺之後的語文論述，以及為臺灣大學編選《大學國語文選》、《大學國文選》為切入點，闡析「國」與「文」在形塑國族意識、召喚文化想像之過程中的關鍵意義與相互關係；再以之與先前郭紹虞、朱自清等人的語文論述，與他們所編選的大一國文教材相參互映，探勘現代國家之大學國文教育中的語文問題。而日本教育體系中之「國語」與「國文」學科之所以成立，以及其所關涉的國族意識與文化想像，正所以作為論析的重要參照對象。

（一）他山之石：日本「國語」與「國文」 學科建置中的「國」與「文」

前文曾述及，具有「現代」意義的「國語」與「國文」二者，其語彙與觀念，都是晚清士人自日本挪用而來。而回到日本的歷史脈絡，此觀念之所以萌

⁵¹ 如郭紹虞於四〇年代之初編選《近代文編》與《學文示例》，所選篇目全屬文言文，重視的是語文寫作訓練；1950年，他與吳文祺、章靳以三人合編商務版《新編大一國文選》，選文與教學目標則完全朝向為黨意與意識形態服務。朱自清先後參與西南聯大與教育部的部編國文教材選，這兩種教材的選文及教學目標亦迥然有別，俱詳前文。

興於明治時期，不僅與當時民族國家觀念之形成，以及時人意欲經由「言文一致」而普及教育、凝聚全「國」民眾之「共同體」意識有關；同時更有欲以日語之表音符號「假名」與當時流通於統治階級的「漢字」相區隔，進而以日本民族自有之語文取代「漢文」的具體進程。它從強調「國語」之於民族國家的重要性開始，繼而制定全國一統的「標準語」；再進而落實於體制內的語文教育，經由「讀書」、「習字」、「作文」等課程，使國人不僅在言說時能「以適當的語言及字句來正確地表達思想」，同時也形成書面文體。如此一來，（相對於「方言」的）「標準語」成為「文章上的語言」，遂能突破時空限制，確保其地位。⁵² 其間，學者上田萬年的論述，尤其具有關鍵性影響。

上田於 1894 年所發表演講詞〈國語與國家〉，可謂當時最具代表性的言論，他認為：

語言，對言說它的人民來講好比血液一般，可以證示為身體上的同胞，亦可證示為精神上的同胞；若以此譬喻日本國語，則日語可謂日本人的精神血液。日本的國體，主要以此精神血液維持；日本的人種，因有此最強固最能永久長存之聯繫而不致散亂。是故，一旦大難臨至，只要有此語言號召，則四千萬的同胞無論何時皆能傾耳垂聽，無論何處亦願赴之，鞠躬盡瘁，不惜一死。⁵³

在此，上田明確提出「國語（日語）可謂日本人之精神血液」之說，主張「國語」乃是喚起國民意識、維繫日本「國體」所不可或缺之要素。此外，在《作文教授法》與〈關於尋常小學的作文教授〉等論述中，他則進一步鼓吹「以語言整理思緒且加以言說，以及馬上將言說轉換為文字形式加以紀錄，乃普通

⁵² 參考（日）安田敏朗著，呂美親譯：〈日本「國語」的近代〉，《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3 期（2012 年 12 月），頁 71-117。

⁵³ （日）上田萬年：〈國語と國家と〉，收入氏著：《國語のため》（東京：富山房，1897 年）。按：初版明治 28 年（1895），日本國會圖書館藏修訂二版，出版於明治 30 年（1897）。

教育中的作文教學之大重點」；⁵⁴「現今的日本語，只要不過於卑俗，儘可能也將之收於文章為宜」，而不必讓學童書寫古語或漢語。⁵⁵循此，日本「語」將成為「文章」的構成基礎，原為知識階層所獨享之漢字漢文，遂漸次為假名與漢文訓讀體取代，而日本各級學校中的「國語（文）」，也因此成為獨立於「漢文」之外的必修學科。⁵⁶

儘管上田的論述曾受到包括他學生時枝誠記等人的批判，然而其影響力終究不容忽視；他的論點，在我們觀照從中國到臺灣的「國語」與「國文」問題時，尤其帶來不少啟發。參照於晚清以來，中國之於「國語」與「國文」的觀念形構、學科建制及相關論述的提出，一個明顯的差異是：晚清士人雖然自日本挪用了「國語／國文」等具有現代意義的語彙與觀念，但卻並不若日本在建構民族國家時，內蘊了將長期介入本「國」語文的他國文字視為「他者」，並亟欲與之相區隔，甚且取而代之的意圖。⁵⁷

漢字與漢文不僅在中國源遠流長，行之久遠，甚且還開枝散葉，在東亞各地形成廣大的「漢字文化圈」。這就使得晚清以來的學者們在論及「國語」問題時，雖然同樣著重於在眾多方言中「統一語言」，培養愛國心；但論及「國文」，重點卻並不在藉由「文」來凸顯、強調「國」的主體性，而是多從文字

⁵⁴（日）上田萬年：《作文教授法》（東京：富山房，1895年），頁7。

⁵⁵（日）上田萬年：〈尋常小學の作文教授につきて〉，《國語論》（東京：金港堂，1895年），頁9。

⁵⁶在明治時期的學制系統中，各級學校有關「本國語文」學科的設置，形態十分複雜，大體而言，中等以上教育稱「國語」或「國文」，以之與「漢文」相區隔（其間也有歸併原本獨立的「漢文」而為「國語及漢文」科者）。大學方面，則經由明治初年的「和漢文學」、「和文學」，最後確立了「國文學」的地位。參見（韓）Lee Yeounsuk（李妍淑）：《國語という思想：近代日本の言語認識》（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頁96-105。陸胤：〈國家與文辭〉，《文學評論》2017年第5期，頁149-158。

⁵⁷同樣情形也見諸當時的朝鮮。長久以來，朝鮮的統治階級與知識階層都以漢字記事表意，「國文」學科建構之過程中，漢字之存廢亦成為其中一項重要論題。參見（日）三ツ井崇著，李欣潔譯：〈開化期朝鮮的「國文」與漢字／漢文的糾葛〉，《東亞觀念史集刊》第3期（2012年12月），頁119-165。

源起、文法修辭，以及如何「以資官私實用」等方面去申言該學科的教學內容及重要性。換言之，所謂的「國族意識」，在「國文」的各級學校課程目標及教材中，其實相對模糊。這一點，從針對小學國文課程而論的劉師培〈國文典問答〉，到抗戰時期部訂《大學國文選》的選文篇目，皆可見一斑。

（二）「國／語文」：戰後初期臺灣的語文論述 與「國族意識」及「文化想像」的形塑

然而，戰後初期的臺灣，情況卻與清末民初迥不相侔。那是一個已經日本殖民半世紀之久，全島人民皆習於以日語文表情達意的語言環境，中、日不同語文的正面交鋒，勢不可免。為了儘速完成「語文復原」並強化國族認同，銜命來臺的許壽裳、魏建功等人除了必須強調學習「（中）國語」與「（中）國文」的重要性之外，如何區辨中、日語文的不同，以及凸顯並宣導中文的特質與優點，更是當務之急。為此，身為臺灣省立編譯館長的許壽裳率先撰寫《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一書，以助成臺胞學習國語文。此書作為省編譯館編印出版「光復文庫」叢書的首發之作，宣示意味極其明顯。⁵⁸ 它開宗明義表示：

自從日本人統治了臺灣五十一年，使得我們臺灣同胞既不會說本國的標準語（國語），也不會讀本國的國文（包括語體文和文言文），……所以我很知道現在的臺灣同胞是多麼迫切地希望怎樣就能說道地的國語，和看懂古今名人所做的文章，並且還能把自己心中所要說的話很自然地

⁵⁸ 許壽裳〈「光復文庫」編印的旨趣〉一文曾表示：「臺灣省編譯館是為了要普遍地供應本省同胞一種精神食糧，使他們能夠充分地接受祖國文化的教養而成立的。所以除了編印中小學教科書以外，還要編選許多社會讀物來供應本省的一般民眾，……使他們對於祖國的文化、主義、國策、政令等一切必需的實用的知識，明白了解，這就是本館現在編印的『光復文庫』的旨趣」。至於該文庫之所以用「光復」為名，乃是因為「這次臺胞重新投入祖國的懷抱，是多麼一件可紀念的事啊！所以用『光復文庫』這名詞來編選介紹祖國的和國際的一切有價值有趣味的新知識，也有著很深的令人警惕的意義在。」收入黃英哲編：《許壽裳臺灣時代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年），頁122。

用本國筆調寫出來，和一般同胞所寫的沒有差別，因此我選定了這一個題目來談，或許能夠對臺灣同胞學習國語和國文時有點幫助。⁵⁹

此書雖然在書名上兼及國語與國文，但對「國語」部分著墨不多，真正的重點，毋寧是落在「學習國文」之上；尤其是著重於如何從「文法」方面洗刷日語文法的影響。所以如此，乃是許壽裳以為，較諸「說國語」，「學國文」要達到「看得懂，寫得出」這一標準，實在困難得多。主要原因，正是在於多年以來，臺灣人接受的都是日文教育，行文造句都難脫日式漢文影響，因此，

為了要使我們臺胞不再寫冒牌的國文，全能以本國文字寫出自己所要說的話，篇篇都成為純本位文化的本國文，所以想特別提出我國文法和日本文法究有那些點不同，並且舉些實例加以說明。⁶⁰

至於魏建功，則是戮力於「國語」論述之建構，以及相關教育的推動。魏建功原為北大教授，早年師從劉半農、錢玄同，是著名的語言學家。他曾擔任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以及編選部訂《大學國文選》的召集人，抗戰結束之後，銜命來臺推行國語，擔任「臺灣省國語運動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長年以來，一直是主導國家語文教育的重要人物。然而，同為推行「國語」，不同的語文環境，所被賦予的任務與期待，卻是明顯有別。其間差異，恰恰揭示出「國／語文」所被賦予的「國族意識」與「文化想像」。

「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成立於 1928 年，時當北伐完成，全國一統，故而旨在各地皆各有方言的情況下，訂定全國通行的語言（國語），以便於全體國民交流溝通；「臺灣省國語運動推行委員會」的當務之急，則是要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半世紀之後，儘速滌清日本的語言文字與文化，藉由「語文復原」而進行「文化復原」，凝聚國族與文化認同。⁶¹也因此，極力辨明「國語」與

⁵⁹ 許壽裳：〈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敘言〉，《許壽裳臺灣時代文集》，頁 125。

⁶⁰ 參見許壽裳：〈學習國文應注意之點〉，《許壽裳臺灣時代文集》，頁 128。

⁶¹ 魏建功曾一再強調：「國語推行在臺灣是一個『文化復原』的運動」。參見〈國語的德行〉、〈國語運動在臺灣申解〉等多篇論述。俱見《魏建功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4 冊。

「日語」的分別，以及揭示體現於語文之中的國族文化異同，遂成為教導臺灣民眾學習國語文過程中的首要之務。魏建功來臺之初曾撰寫〈國語的德行〉一文，所揭示的訊息遂特別值得關注。

該文一開始，首先闡明「文化」之於語言形成的重要性，指出：「我們的國語標準的形成是文化的自然演變，它的推行也靠著文化自然的發展」。中文與日語文表現形式不同，不只根植於兩國民族文化中處世態度的差異，更關乎於「德行涵養」：

我們民族有一種豁達大度，它的來源與孔子人生哲學裡的「恕」有關係。這種恕道發展在我們的處世態度上，是「適可而止」，是「不為己甚」，是「易地以處則皆然」。我們的語言標準系統也就是從這種處世哲學裡陶鑄成功的。……

我國的語言極為自由而平等，不像日本語，長輩與晚輩，上官與屬僚，官吏與人民，男子與女子，中間有用不用敬語的分別。我們的敬與不敬，是靠態度語氣等來表現的而不是日本人那樣機械的形式上劃分的。我們國語的推行當然是「和平」的，而不誇張聲勢的。真的「自由平等」樹立在「恕道」上，凡是出言不遜的一定沒有正規，失去標準的。只有遵用標準語言，才可以得到「公正」的態度，才可以分出「嚴明」的是非。我們的國語有極端重的禮貌而不具行迹。推行國語不僅是口頭語音的形迹改改變，還要有民族德行善良的涵養。⁶²

論者曾指出：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特色，每每藉由該民族的語言文字而體現。⁶³在此，魏建功將語言與民族文化相連結，自有其學理依據；但要將它提昇到「道德」層面，顯然是牽強附會，過猶不及。不過，回到戰後初期的臺灣歷史現場，魏建功來臺的主要任務，原就是要在鋪天蓋地的日語環境中推行國語，他認為「一切語言文字間的隔閡，表現了文化道德的衝突」。藉由語言而

⁶² 引文俱見魏建功：〈國語的德行〉，同前註，頁 373-375。

⁶³ 參見（德）威廉·馮·洪堡特著，姚小平譯：《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

強化國族意識與文化涵養之外，同時訴諸「道德」，無非是想讓推行國語一事深入大眾生活，增益其合理性。因此大肆抨擊日語是「貌為恭順的有毒工具」，倡言希望臺灣人民藉由「說國語」而祛除日本文化的毒害，「陶冶出新中國的好公民來」，其說未必可取，卻適所以投射出當時學者對於臺灣「語文復原」一事的焦慮與急迫感。⁶⁴

正是如此，落實到現實的語文教育，自然也因為一切必須從零開始，而與先前有不同考量。許、魏二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皆進入臺灣大學中文系任教，共同負責全校的國語文教育，並藉由《大學國文選》與《大學國語文選》，落實其所主張的「由『語』而『文』」的推展次第，以及因應臺灣特殊時空環境而生的國族與文化關懷。以之與前述其它各國文選本相互參映，尤其有助於我們綜括思考大學國語文教材中，關於「語」與「文」、「文」與「白」之取捨問題，以及在「國族意識」、「文化想像」與「語文形構」交相為用之下的「以資實用」與「文化傳承」。

（三）「語」與「文」，「以資實用」與「文化傳承」： 歷史脈絡中的多層次錯綜關係

據魏建功之說，所謂「由『語』而『文』」，指的是「由語句而文章」，「由語音而文字」，「由語言而文學」三個方面；這是他對於「新文學運動」基礎工作的理解，也是他來臺推行國語工作時的重要綱領。⁶⁵然則，「語」與「文」向來交纏錯綜，相生相成，二者之間，是否具有如此具體的先後次第關

⁶⁴ 見〈國語的德行〉：「『能諂善驕』，是我國論人處世的精語。我們語言的標準裡是絕迹沒有培養諂驕的形式和意味。我們希望從這個標準裡陶冶出新中國的好公民來。先讓我詛咒一下日本語言的毒害，日本人推行日本國語的狠辣。日本人對我國的惡意宣傳固然是侵略思想從中作怪，同時還有那一套表現思想的語言在助虐。我因此要指出：中華民國的國語不是日本國語那樣貌為恭順的有毒工具，要把它自然爛熟了，永久消除怪戾之氣，才能說的像是『話』」。

⁶⁵ 魏建功：〈國語運動書端〉，《魏建功文集》，第4冊，頁305。

係，其實大可商榷。魏建功是著名的語言學家，對於「語」「文」之間的複雜互動，當有更多理解；之所以提出相對簡化的論述，應是當時臺灣特殊語文環境使然。而如何「以資實用」，顯然正是其中最重要的考量。⁶⁶這一點，不僅使得臺大的國語文教材與前述其它各選本，產生了內在聯結與對話，也貫串了「國」與「文」，以及「國語」與「國文」的諸多相關問題。事實上，一旦論及語文的「應用」，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文體」的選擇——日常言談，固然出之以「口語」，然而書寫時，究竟應該用「文言」體？還是「白話」體？而這當然同時涉及「國『語』」與「國『文』」之間，多層次的錯綜關係。觀瀾索源，對它的思考，亦必得上溯至晚清民初以來的「國語」與「國文」概念，其及所涉及的「言文一致」、「國語運動」、「白話文學」與「文學革命」等問題。

一般而言，「國『文』」所指涉的是「『書面』語」，而「國『語』」則兼有「標準『語』」與「白話／語體『文』」二義。「國語」與「國文」之間的關係，則依隨時間推移而有不同變化。首先，如前所述，「國文」一詞係由日本譯介而來，論述生成於晚清，明訂作為「現代」大學之必修科目，則是始於1929年。「國語」一詞古已有之，然而現代「國語」概念，同樣引介自日本，時間更稍早於「國文」。它被引進之初，雖具有（相對於「方言」）之「標準語」的現代意義，但「國語統一」或「國語運動」在當時僅止於朝野有心人士倡議階段，官方並未從事於此。倒是它的「言說」特質，適所以與「言文一致」理念中的「言」相連結。「言文一致」旨在讓口說語言與書面語言一致，以期普及教育，啟蒙大眾；「國語」遂由此衍生出（相對於「文言」的）「白話文」涵義；此時，它與「國文」的關係，應僅建立於（不涉及「標準語」的）「文」

⁶⁶ 其編選《大學國語文選》時，所念茲在茲的，即是各類現實生活應用需求。如國語課程著重「能說」、「能讀」；教學方法則要多方變化，經由誦讀、演講、辯論、座談等方式，以「鼓勵應用」。魏建功：〈國立臺灣大學一年級國語課程旨趣〉，《大學國語文選》，頁1。

的層面。⁶⁷因此，在大學猶未有「國文」課程項目時，當時蒙小「國文」教材之取捨斟酌，大多體現於「口語」與「書面語」（淺近文言）的邊際游移。

不久之後，民國肇造，「國語統一」是為中華民國新政建設的一部分，它開始於1913年，政府召開「讀音統一會」構擬民族共同語的框架，會中製訂統一的「注音字母」和漢字標準讀音；1920年，教育部訓令各國民學校，將小學一、二年級「國文」課程改為「國語」，所有文言課文，從此全數改為語體文，⁶⁸「統一語言」與「普及教育」，遂共同成為國家之既定政策。以「標準國語」為基準的「白話語體文」，亦逐漸成為一般社會大眾習用的書寫文體。「國語」作為「國文」的對立面出現，並成為既對立，又辯證統一的兩組觀念。

然而，即或同為「白話文」，往往因為它究竟旨在日常生活應用，抑是正式文書往來，以及是否具有「文學」性，而有不同之文體想像與書寫規範。這就又關涉到稍早的「文學革命」與「白話文運動」。

「文學革命」，主要由北大《新青年》、《新潮》諸子所倡議。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胡適、傅斯年等，皆先後就文學語言的改良熱烈討論。所措意者，原不在口說語言，而在於書寫文字。全國語言統一與否，並不是他們關切的重點。因此，討論之初，雖也大量使用「國語」一詞，所指涉者，實與晚清時期相同，都是（與文言相對的）「白話『文』」，而非（與方言相對的）「標準『語』」（Mandarin）。所不同者，晚清的「國語／白話文」以實用為要，不考慮「文學性」；但「文學性」卻正是「文學革命」的重點訴求。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主張「白話文」應正名為「國語文學」，目的即在提高白話文地位。副標題「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意思是說：一定要先以「國語（白話文）」作為文學的書寫語言，之後的國語（白話文），才會成為具有

⁶⁷ 參照彼時若干地方性的《白話報》，其書面語每每因隨當地的「方言」用語，呈現不同之書寫樣貌。

⁶⁸ 有關國語運動的發展，參見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上海：時代出版社，1950年）。

文學性的語言。而「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⁶⁹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論述。⁷⁰

不過，由於胡適等人先後都加入了「國語研究會」與「國語統一籌備會」，也開始從事「國語統一運動」，傅斯年提出另外引入「口語」及「歐化中國語」兩條思路，以充實並活化「白話文學」；⁷¹「國語運動」與「文學革命」，於是正式合流。⁷²「語」與「文」之間，關係不僅更形密切，而且開展出更多的辯證性。

但另一方面，晚清雖有「言文一致」之議，卻實為針對啟蒙一般大眾而發；當時「以資官私實用」的「應用」文體，仍然非「文言」莫屬。胡適等人所倡議的文學革命，主要是著眼於「文學」，也就是「文藝文」的書寫文體改革。因此，文學革命研議之際，錢玄同即率先主張「應用文」宜「以國語為之」，即是希望將先前多用於社會中下階層、易與俚言俗語混為一談的「白話文」，也提升為知識分子之間的「書面語言」。其後郭紹虞〈新文藝運動的新途徑〉一文，甚至直接表示：

白話文是文藝文，同時也是應用文，那才是白話文的成功。⁷³

原因無它，正是「文言文」在知識分子之社會「應用」方面的地位高居不下，無可取代之故。

循此，再回到四〇大學國文選本的問題，將更有助於我們了解各選本背後

⁶⁹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文學論——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收入《文學改良芻議》（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頁57。

⁷⁰ 臺灣大學的《大學國文選》，從許壽裳的手稿到1948年的改訂版，三個版本都收入此一篇章，亦可見編者之用心。

⁷¹ 見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頁171-184。

⁷² 以上關於「國語／國文」的論述，並見於梅家玲：〈有聲的文學史——「聲音」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追求〉，《漢學研究》第29卷第2期（2011年6月），頁189-233。

⁷³ 郭紹虞：〈新文藝應走的新途徑〉，《語文通論》，頁88。

的目的，及所關涉的問題。參照前述四種選本，最令人矚目的現象當然是：各選本之於「文言／白話」教材的取捨，呈現巨大差異：由郭紹虞主編的燕京大學教本，與教育部主導的部訂選本，全為文言文；西南聯大與臺灣大學的選本，則文白兼收，臺大的《大學國語文選》甚至在純為白話語體之中，還收入廈語故事與臺語歌謠。所以如此，恰恰是回應了不同時空環境中，對於如何「以資實用」的權衡斟酌。四〇年代之初，中國大陸的新文學固然方興未艾，當時一般的應用文書往來，仍以文言書寫為主。這一點，郭紹虞在為《近代文編》撰寫序文，說明編纂旨趣時，便說明得非常清楚：

文言文之所以有其殘餘勢力者，即在社會上猶有應用的需要，而新文藝尚不足以應付這需要的緣故。⁷⁴

〈大一國文教材之編纂〉一文，更以「應用」為其選文多為文言而說解：我們之顧及文言，正與迷戀骸骨者不同，不以文言為美文，而以文言為時下的應用文。⁷⁵

此外，即使是身為新文學大家、素來重視白話文寫作的朱自清，也不認為當下的國文教材應以白話語體文為主。但他所著眼者，除了國文課程的目的是否僅在「應用」之外，同時還考慮到「大學」與「中學」教材的聯結與區隔問題。由於中學國文教材已多選入唐宋以後的文言篇什，站在教育部立場，作為「大學」國文教材，自應多選先秦兩漢文，以求學習次第之連貫與精進。此外，在回應朱光潛對於部訂大學國文選目全為文言的批評時，他也表示：能藉由語體文而將語文訓練與文化思想訓練合而為一，最合乎理想，也最能引發學生興趣，然而「時機還沒有成熟」，只要「日子越久，語體文應用越廣，大學國文選目自然會漸漸容納它的」。⁷⁶至於時任部訂本召集人的魏建功，更是強調大學國文已不限於「能」（寫作訓練）而必及於「知」（文化思想）的訓練，亦

⁷⁴ 郭紹虞：〈新文藝應走的新途徑〉，同前註，頁 85。

⁷⁵ 郭紹虞：〈大一國文教材之編纂〉，同前註，頁 147。

⁷⁶ 朱自清：〈論大一國文選目〉，頁 53-55。

即能夠「閱讀關於國家民族思想文化的古書」。⁷⁷這當然也就說明了部訂大學國文選在編選要旨上何以割捨寫作表達，僅就閱讀立論。

然則，無論《學文示例》、《近代文編》，抑是部訂《大學國文選》，它的編選都是以當時中小學國文課程已奠定的語文與文化訓練為基礎，再求精進。即使是高度重視新文學與語體文訓練的西南聯大，其編選大學國文教材，同樣不廢文言；其指向，同樣是希望藉此「繼承古人的精神」。所不同者，僅在於選文取向更提升至美感意趣、人生境界，並強調「以現代的語言表示現代人的思想與情感」。⁷⁸

然而戰後初期臺灣的大學國文教育，卻完全不在此一脈絡之中。由於必須頡抗、滌清既有的強大日語文化，中文的「語文復原」又必須從零開始，從無到有，臺灣的「大」學生在缺乏中小學國語文教育基礎下，學習「國文」，遂必得兼及「語」、「文」，並且「由『語』而『文』」。其間，不僅納入「方言」文學作為學習國語與國文的過渡，主事者更多將語文學習融合於國族意識與文化想像，以強化臺灣同胞對於「祖國」的向心力。它的進程，實與明治時期的日本若相彷彿。

1947年10月，《國立臺灣大學校刊》刊登了時任校內共同科教員李竹年的〈我對於本校國文教學的意見〉一文，評論當時新編出版的《大學國文選》，其論點即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本校一年級用的國語教本，已經編印了出來；國文課用的《大學國文選》，在本學期開始時已由中國文學系幾位先生選定印就，在應用著了，我雖未曾參加這本書的編選工作，但我覺得這本書內所選的三十篇文章，是適合我們的教學對象——臺大學生的。這裡面選的大半是現代人的白話文，但也有一部分是現代人作的「現代文言文」。……我們認為教臺灣學生，在現階段，還只能以白話文為主，少量的夾一點現代人

⁷⁷ 魏建功：〈答朱孟實先生論大一國文教材兼及國文教學問題〉，頁56-61。

⁷⁸ 楊振聲：〈新文學在大學裡——大一國文習作參考文選序〉，頁2-3。

的淺近的文言文是可以的。像外省有些大學用的國文教本，充滿了周秦漢魏，經史子集的文章（西南聯大的除外），高深誠高深矣，但不適合於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將來再過一二年，再漸漸加一些時間較古而詞意仍較淺的散文和韻文，以培植他們欣賞中國舊文學的能力，藉以瞭解中華民族的真實的精神生活的歷史。⁷⁹

與此同時，擔任醫學院國文教師的張則貴也為文響應，表示：「國語文既是構成民族國家的基本要素，客觀的精神生活之反映」，國語文教學就「不只要教『大』學生們國語的『說』，『聽』，『讀』，『寫』與『作』；養成他們的國語理解力與表現力，更擔負著一個最容易被忽略而最重大的責任」；簡言之，那就是：

要以國語文為工具，以分析，理解，鑒賞——文化領域內最尖端的文藝作品以及其他論文等——為媒介，使學生們理會，體得民族國家的智慧，德行，文化精神以及人類共通的「生」與人性美等，培養共同的體驗；陶冶道德的人格；也就是形成關係密切的有機的共同社會之準備；完成民族國家生存的第一個基本條件。⁸⁰

這兩篇文章，都是因應於當時臺灣語文現況而立論，前者呼應「由語而文」的學習次第，以及期藉由淺易古文以了解過去；後者再次強調「國語文」之於民族國家構成的重要性，都見證了「國」與「文」在現代國家中的交相為用，以及大學國文如何因隨時空移易而進行其內涵與教育目標的自我調整之迹。而從李竹年所提及的「現代白話文」、「現代文言文」與「淺近的文言文」等用語及其間的學習次第看來，所謂的「白話文」與「文言文」，並非對立的兩極，

⁷⁹ 李竹年：〈我對於本校國文教學的意見〉，《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10期第6版（1948年3月16日）。李竹年（1904-1988），又名何林，早年曾與臺靜農、李霽野等共組未名社，1946年，與李霽野因老師許壽裳之邀而來臺灣參與臺灣省編譯館工作，編譯館裁撤後，進入臺大中文系任教，許壽裳遇害後，隨即離開臺灣，返回大陸。

⁸⁰ 張則貴：〈三十七年度國語文教育問題〉，《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10期第7版（1948年3月16日）。

反而具有遞進的層次關係。參照於臺大《大學國文選》前後兩個版本選文中的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選文比例變化，以及郭紹虞為編選《學文示例》所撰寫的〈中國文字型與語言型的文學之演變〉一文所論，亦可看出「文言」與「白話」、「語言」與「文字」之間辯證發展的動態關係。

四、餘論：「國」的超越，「文」的追求 ——大學國文教育的當代反思

本文以四〇年代的幾種大學國文選本為聚焦點，意圖以小見大，就「國文」在現代大學中作為必修學科的發展進程與相關問題予以梳理；雖是勾沈發微，探勘過去，終極關懷卻是希望鑑往知來，直面當下，意圖為現今諸多「國文」問題追本溯源，進行學術性的研析。根據前文所述，「國文」此一概念從醞釀成型到進入正規學制，並非橫空出世，一蹴而躋，而是在長時期不斷的摸索研議之中逐步推展而致。其間的千迴百轉，實則是連串觀念、制度、文體想像、教材教法的不斷嘗試調整，所投射出的，正是時代轉型、空間移易之際的多方折衝。在全文即將告一段落之前，在此亦試圖就前文所論，提出進一步的綜論與反思。

誠然，回溯過往，清晰可見的是，無論時空如何遷易，各階段「國文」教育的內涵，始終以「讀書（閱讀）作文（寫作）」為主軸；最重要的目的，亦無非是「以資實用」。至於「保存國粹」與「傳承文化」，則是對於培養高級知識分子的期待。大學階段之所以仍然需要國文課程，以及課程選文中，「文言」經典所以不可或缺，原因適在於此。緣於漢字漢文不僅為中國所固有，而且流澤廣被，因此，發軔於蒙小教育的晚清「國文」概念，所強調的重點遂落在漢字與漢文法的學習之上，並視之為一切知識習得的載體；直到初、高等學堂的「中國文學」與「中國文辭」學科，才漸次提升至「通解經史古書，傳述聖賢精理」。而這也意謂「國文」與「國粹／固有文化」的連結，主要乃是建立在「經史古書」與「聖賢哲理」之上。因此，倘若不是因為日本殖民臺灣半

世紀，讓臺灣體驗到中日語文的頡抗交鋒，「『國』文」的國族界闖意識，或許未必會被如此凸顯。

正是如此，這就促使我們思考：如果長久以來，語文教育的主要目的僅在於「以資實用」，那麼，藉語文而尋求，或建構當前的、以民族主義為本位的「國族認同」，是否只是局限於一時一地的迷思？以魏建功來臺戮力從事「語文復原」一事為例，其間的曖昧破綻，處處可見，⁸¹更遑論〈國語的德行〉中種種牽強附會之論。這正所以說明：以「國」之名去規範「文」的教育走向，雖然在國家政策主導之下，不乏立竿見影之效，但長久看來，反而暴露出其間的荒謬，以及主政者的一廂情願。

相對地，若我們再次回顧西南聯大的國文教材選本，或許可以有不同的省思。四〇年代初期，即或中日戰爭方興未艾，舉國民族主義情緒沸騰，在楊振聲、朱自清等學者引領下，西南聯大編選國文教材，非但沒有刻意凸顯「國族意識」，反而不斷用心於琢磨「文」在人文教育上的各種可能性。它的「以資實用」，體現於教材選文古今兼收，並且因應時勢趨向，重視白話語體文習作；它的「文化傳承」，不在於訓練學生閱讀艱澀古奧的上古典籍，反而著眼於彰顯美感意趣、標舉人生境界，為學生的思想素質與人生態度帶來啟發性影響。楊振聲當年為大一國文習作參考文選撰寫序文，文中所說的：「讓我們繼承古人的精神，不要抄襲古人的陳言；讓我們放開眼光到世界文學的場面，以現代人的資格，用現代人的語言寫現代人的生活，在世界文學共同的立場上創造現代的文明」。⁸²擲地有聲，直到今天，依然振聾發聵，值得重視。

循此，我們亦不妨擺脫「國」的桎梏，轉而省察「文」原本就內蘊的多元繁複特質。即就楊振聲序文中所提到的「世界文學」與「現代文明」之說看

⁸¹ 魏建功銜命來臺，意圖將「日語臺灣」復原為「（中華國民的）國語臺灣」，然而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前，所通用的主要語言實為閩語與客語，其所復之「原」，既非「原初」語言，亦非臺灣在地方言。相關論述詳參梅家玲：〈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魏建功與臺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

⁸² 楊振聲：〈新文學在大學裡——大一國文習作參考文選序〉，頁 2-3。

來，當時西南聯大的國文教育目標，其實就已經超越了一般民族國家的本位思想，以及「以資實用」與「傳承文化」的既有框架。「文」不只是文字、文書，更是文學、文化、文明，具有創變的動能。它既可以連結到歷史傳統，也開展出與當代世界對話的契機。更何況，無論是《文心雕龍》等古典文論，抑或近年來備受矚目的「世界文學」、「華語語系文學」論述，無不揭示出「文」的繁複多變，兼容並包。相形之下，晚清以來的「言文一致」觀念，凸顯出聲音／語言／國語在啟蒙教育、文體革新方面的積極作用，固然豐富了「文」的內涵，卻也同時因為民族主義帶來的浪漫國家想像，⁸³ 為它設下無形藩籬，縮限了「文」的能動性。

而今，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儘管學界已就民族／國家主義帶來的流弊多所檢討，檢視現今諸多與「國文」相關的爭議，無可諱言地，對於「國」的認知與詮釋，正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然而，如果鑑往的目的在於知來，可見的是，相對於執著「國」而劃地自限，「文」卻恰恰以其貫通古今、與時俱進的特質，帶領我們走向遼闊無垠的天地，召喚著開創未來的無限可能性。借用當代歷史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所提出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之說，⁸⁴ 作為大學國文的教學與研究者，是否也應該「從『國家』中拯救『國文』」？如何超越（受限於民族主義框架的）「國」的爭議，致力於（以漢字漢文為載體，並蘊含豐富深厚之文化基底的）「文」的追求，如何藉由「文」的包容性、開創性與能動性，去為當代大學生厚植文化涵養、開發自我創造的潛能，應是值得不斷思考琢磨的方向。

（責任校對：王誠御）

⁸³ 參見（日）柄谷行人著，薛羽譯：〈民族—國家和語言學〉，收入柄谷行人：《民族與美學》（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35-160。

⁸⁴ 杜贊奇研究中國現代史，曾層層剝解線性歷史的困境與民族主義的局限，提出「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之說。參見（美）杜贊奇著，王憲明、高繼美、李海燕、李點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 田正平：〈中國教育近代化研究叢書·總前言〉，王建軍：《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
- *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
- 朱自清：〈中國文的三種型——評郭紹虞編著的《學文示例》〉，《清華學報》第14卷第1期（1947年10月）。
- 朱自清：〈論大一國文選目〉，《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
- 朱光潛：〈就部頒《大學國文選目》論大學國文教材〉，《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42年9月）。
- 朱 遜：〈介紹《學文示例上冊》〉，《國文雜誌》1943年第1卷第4、5期合刊。
- 汪曾祺：〈晚翠園曲會〉，《汪曾祺全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98年，卷六。
- * 何二元：《現代大學國文教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
- 李竹年：〈我對於本校國文教學的意見〉，《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10期（1948年3月16日）。
- 李瑞山、陳振、鄒鐵夫：〈民國大學國文教育課程教材概說〉，《中國大學教學》2015年第8期。
- 胡 適：《文學改良芻議》，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
- 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上海：時代出版社，1950年。
- 郭紹虞：《學文示例》，上海：開明書店，1969年。
- 郭紹虞：《語文通論》，香港：太平書局，1978年。

- 郭紹虞、吳文祺、章靳編：《新編大一國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50年。
- 陳平原：〈中國大學百年？〉，《歷史、傳說與精神——中國大學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
- 張長弓：〈讀《學文示例》〉，《教育函授》第1卷第1期（1948年1月）。
- 張則貴：〈三十七年度國語文教育問題〉，《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10期（1948年3月16日）。
- * 梅家玲：〈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魏建功與臺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7期（2010年2月）。
- * 梅家玲：〈有聲的文學史——「聲音」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追求〉，《漢學研究》第29卷第2期（2011年6月）。DOI:10.6770/CS.201106.0189
- 陸 胤：〈國家與文辭〉，《文學評論》2017年第5期。
- * 黃英哲編：《許壽裳臺灣時代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年。DOI:10.6327/NTUPRS-9789860251302
- * 黃曉蕾：《民國時期語言政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 * 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
- 葉 曙：〈我所認識的八位臺大校長〉，《閒話臺大四十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年。
- 葉至善、葉至美、葉至誠編：《葉聖陶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
- 歐陽軍喜：〈在中西新舊之間穿行：五四前後的清華國文教學〉，《清華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 *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 楊 起、王榮禧：〈追思楊振聲先生〉，李宗剛、謝慧聰選編：《楊振聲研究資料選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
- 楊 起、王榮禧：〈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楊振聲先生在昆明〉，李宗剛、謝慧聰選編：《楊振聲研究資料選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
- 楊振聲：〈新文學在大學裡——大一國文習作參考文選序〉，《國文月刊》

第 28、29、30 期合刊（1944 年 11 月）。

《蒙學報》21 冊（1898 年 4 月）。

* 臺灣大學中文系編：《大學國文選》，臺北：臺灣大學教務處出版組，1947 年。

臺灣大學中文系編：《大學國語文選》，臺北：臺灣大學教務處出版組，1948 年。

劉師培著，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揚州：廣陵書社，2008 年。

劉東、吳耀宗整理：《西南聯大國文課》，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 年。

蔡元培：〈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5 冊。

謝循初：〈今日大學課程編制問題〉，《安徽大學季刊》1936 年第 1 期。

藍博洲：《麥浪歌詠隊》，臺北：晨星出版社，2001 年。

魏建功、吳守禮編：《大學國語文選》，臺北：臺灣大學教務處，1947 年。

* 魏建功：《魏建功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

魏建功：〈大學一年級的國文問題〉，《高等教育季刊》第 2 卷第 3 期（1942 年 9 月）。

璩鑫垚、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

顧黃初編：《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

（日）上田萬年：《作文教授法》，東京：富山房，1895 年。

（日）上田萬年：〈國語と國家と〉，氏著：《國語のため》，東京：富山房，1897 年。

（日）上田萬年：〈尋常小學の作文教授につきて〉，《國語論》，東京：金港堂，1895 年。

（日）三ツ井崇著，李欣潔譯：〈開化期朝鮮的「國文」與漢字／漢文的糾葛〉，《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3 期（2012 年 12 月）。

DOI:10.29425/JHIEA.201212_(3).0004

(日) 安田敏朗著，呂美親譯：〈日本「國語」的近代〉，《東亞觀念史集刊》第3期（2012年12月）。DOI:10.29425/JHIEA.201212_(3).0003

(日) 柄谷行人著，薛羽譯：《民族與美學》，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6年。

(美) 杜贊奇著，王憲明、高繼美、李海燕、李點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

(德) 威廉·馮·洪堡特著，姚小平譯：《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韓) Lee Yeounsuk (李妍淑)：《國語という思想：近代日本の言語認識》，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ds.). (1947). *Daxue guowen xuan* [Selected works for college Chinese literature]. Taipei: Taiwan Daxue Jiaowuchu Chubanzu.
- Fu, S.-N. (1919). *Zenyang zuo baihuawen* [How to write in vernacular language]. *Xinchao*, 1 (2), 171-184.
- He, E.-Y. (2017). *Xiandai daxue guowen jiaoyu*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modern universities]. Shanghai: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Huang, Y.-Ch. (Ed.). (2010). *Xu Shoushang Taiwan shidai wenji* [Collected works of Xu Shoushang in Taiwa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X.-L. (2013). *Minguo shiqi yuyan zhengce yanjiu* [A research on Republican China's language polici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 Li, J.-X. (1935). *Guoyu yundong shigang* [A historical outline of the Movement of

- National Language].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 Mei, J.-L. (2010). Zhanhou chuqi Taiwan de guoyu yundong yu yuwen jiaoyu: Yi Wei Jiangong yu Taiwan daxue de guoyuwen jiaoyu wei zhongx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Mandarin) Movement and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in early post-war Taiwan: Taking Wei Jiangong and the national language (Mandarin)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s a focus of the study]. *NTU Studies in Taiwan Literature*, 7, 125-159.
- Mei, J.-L. (2011). Yousheng de wenxueshi: Shengyin yu Zhongguo wenxue de xiandaixing zhuiqiu [A “voiced” literary history: The “voice” and the pursuit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Studies*, 29 (2), 189-223.
- Wei, J.-G. (2001). *Wei Jiangong wenji* [Collected works of Wei Jiangong].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 Zhu, Z.-Q. (1993). *Zhu Ziqing quanji*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Zhu Ziqing].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